

目 录

范筑先将军殉国处

.....许继善（ 1 ）

对国民党聊城县党部的回忆

.....倪宗周（ 5 ）

附：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聊城县党部

组织情况.....张远庆（ 14 ）

聊城围城期间城内见闻

.....耿 振（ 16 ）

我所知道的聊阳县

.....李培现（ 29 ）

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

和发展.....王其彦（ 41 ）

回忆山东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

.....邓愧余（ 58 ）

- 我对私立文德小学的回忆
.....周乐亭（71）
- 东临道道立模范小学
.....胡国典（79）
- 聊城四大书庄
.....金紫垣、胡国典、刘伯纪（83）
- 聊城中华书局简介
.....金永昌（109）
- 解放前聊城的金银首饰业
.....刘延忠述、周莲霞记（116）
- 解放前聊城的中药铺
.....朋南、庆顺（126）
- 聊城地名初探
.....孙元芳（144）
- 聊城关帝庙琐谈
.....高金福（153）

闲话龙湾“静业禅林”

.....李震旭 (180)

谈谈聊城灯棚

.....仓季明 (187)

聊城古八景

.....吴运涛 (192)

关于征集范筑先将军史料的启事

..... (206)

附：范筑先将军史料征集参考要点

..... (208)

质疑·补充·订正——来函摘登

..... (211)

范筑先将军殉国处

许继善

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护守聊城与日寇作战中壮烈殉难，其殉难处究竟在哪里？有几篇“回忆录”中说法不一：有的说在东门里，有的说在万寿观东北，还有的说在北门里。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搞清楚的重大事情。最近“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纪念碑即将在山东聊城兴工建造，但范老殉国地址尚未肯定下来，使我心里非常焦急。恰巧，老朋友李士钊同志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晚到我家里来叙谈。我问起他这件事时，他说：“这个问题早在三十三年前就已经清楚地解决了。范老的贴身警卫员之一凌作善，于一九五三年正月十五左右的一

天，曾领着我到范老当年殉国的地点察看并亲自作过指点。”李士钊同志在范筑先将军坚持鲁西北抗战时期，曾任鲁西北《抗战日报》编辑、记者，常同范老外出随军作战。为本地区和全国性报刊如：《新华日报》、《全民抗战》、《战地知识》、《国讯》等处写过大量的战斗新闻报道。他和凌作善等警卫人员都很熟悉。他是当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左右偕同报社的几位同志退出聊城的。这次回聊探亲与凌相会，谈起当年聊城战斗的情况，特别问到范老殉国确实地点所在？凌说：“当时守城部队和日军的战斗十分激烈，由于外围部队抵抗不力，七百余名日军十四日上午十点后就由城东、城南、城西分三路很快包围了聊城，加上四面环水，退路受阻，范老亲自在东城墙上指挥抵抗。我们三、四名警卫人员包括庞文龄、刘祥仁、孙聘之等也随同在城墙上作战，

当双方伤亡很重的激烈战斗时刻，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用平射炮轰破东门，爬上城墙后，又向左右展开进攻。范老左臂受重伤，但仍走下城来继续指挥部队进行巷战，战斗到城中央光岳楼下时，他的腿部又受了重伤，我们搀扶着范老且战且走。走到楼北大街路东白衣堂胡同西口时，范老就停脚不再前进了。我们想背着他藏到胡同内的德国天主教堂医院治疗、隐蔽，遭到范老的严词拒绝，他遂拔出防身手枪，自戕殉国。这是大家所意料不到的，显示了范老与日寇誓不两立的坚强意志和民族自尊精神”。他们谈着话，凌作善领着李士钊到了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的地点，指着说：“就是这里”。随说随哭的泣不成声。这个地点在光岳楼北路东，即原地委机关东大门向东去的胡同口。范老牺牲后凌作善跑到城西北隅十县胡同路北一个群众家里藏起来，后来又混出西城

门外，在吕祖堂西边路北一家群众的碾盘底下藏了一夜，才寻机离开聊城的。聊城解放后，凌作善先住东门里南顺城，后来搬到南门里考院街西头路南一处宅院中落户。他们这次相会时，凌作善正在那里住。我们认为：凌作善谈范筑先将军的殉国地点是可信的。他是范老的亲近警卫员之一，范老殉国前一直跟随在范老身边，范老壮烈殉国前后的真实情况是他亲眼目睹的。凌作善原是临沂县东乡的“绿林”，受过范老的亲切教诲，把他引上抗日的道路。他对范老忠心耿耿，视如再生父母，感情深厚，事隔多年，提起范老时仍然痛哭流涕，我认为他们这次所谈的有关情况，可信程度较强，特整理出来奉献给关心这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同志作参考之用。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日聊城

对国民党聊城县党部的回忆

倪宗周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丁惟汾（鼎丞），由北京南下与蒋介石携手合作，整理党务。山东党务由丁惟汾派王子壮等到鲁西活动，自此聊城三师、二中有了国民党组织，是以当时在山东有“丁家党、蒋家军”之说。

王子壮是丁惟汾手下的贴己人，他在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以鲁西党务特派员名义来到聊城，找到聊城三师旧制十级学生张丕介（圣和）、朱辅臣（彦青），通过三师学生自治会，秘密组织国民党。其时虽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在北方（包括山东）是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被禁止，一旦发觉就会被镇压。当时第

一批加入国民党的有三师旧制九级学生刘珍甫（金钰）、刘见高（培誉），十级学生张丕介、朱辅臣，三三制一级学生赵文涛、张廷焕（文蔚）等。三个班级中有国民党员二、三十人，其中张廷焕、孙东曜（后改名赤涛）后来均成为共产党员。

一九二五年秋，在聊城三师秘密成立了国民党鲁西县委员会，负责人为常务委员张丕介、宣传部长朱辅臣、训练部长刘珍甫、秘书张廷焕。党务活动范围在鲁西所属二十九个县。北起德州，南至寿张，东到平阴、东阿，西南达濮县。其组织机构设置是三个人以上建一个区分部；三个区分部成立区党部；三个区党部成立县委。因为当时党员都是三师、二中学生，主要活动也在三师、二中。活动的内容为宣传三民主义等国民党的主张和发展党员。学生中的党员假期回到家乡，宣传国民党的主张，组

织农会（民团），反对军阀统治。聊城、堂邑、临清、清平、濮县、茌平、高唐、恩县、阳谷等县都有三师、二中的学生党员，因此，暗地都有国民党的活动，而以阳谷活动最为活跃。

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党聊城县党部成立，设在三师，它包括鲁西各县区分部、区党部，属于地区组织。负责人仍为张丕介、朱辅臣、刘珍甫、张廷焕。暑假后张、朱、刘毕业离校去了济南，由张廷焕负责。同年秋，张廷焕到济南开会遇到同乡李思孝，被李说服，携国民党人员名册加入了共产党。

由于张廷焕加入共产党，带走了名册，暴露了国民党底细，一九二七年春，山东省党务联席会议决定，派刘珍甫为鲁西党务联席会议特派员，来鲁西各县重新组织县党部。聊城县党部由孙寒光、王俊亭、舒秋溪三人负责，以

靖堤口为基地组织区党部（即县党部）。下属几个区分部：五乡社区分部有杜僖元（乐亭）、杜仰奎（伯祥）等人；靖堤口区分部有王俊亭、王金钊、杨秀亭、徐超凡等人；孙集区分部有孙子彬、孙继庆（吉亭）等人；孙丰区分部有孙寒光（润时）、孙润之、孙玉堂、孙林亭等人。靖堤口区党部成为一县党务活动的总基地，后来城区双街耶稣教堂学生中的国民党员袁盛甫、桑兰亭、桑珠庆等，有时也去靖堤口开会、请示党务活动。主要是在暗地里吸收党员，组织农民协会（城区组织工会）。这些活动当时在北洋军阀（奉系）镇压下不能公开。

一九二七年末——一九二八年初（腊月二十三日下午），共产党发起坡里暴动后，国民党组织民团伺机夺取乡政府，建立区公所，与反对他们的掌权地主争夺乡、区政权。如聊堂

民团联合；王慕桥（聊）、许中明（堂）杀死当时省参议员堂邑城里西街大地主许海如等事件。许海如系掌权地主，反对国民党，在聊城北关被枪毙。

一九二七年冬，国民党在聊城西南乡靖堤口村王慕桥家召开了国民党聊城县代表会，选出了国民党聊城县党务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七人，监察委员一人，组成了执、监委员会。其中：

执委会：常务委员孙寒光；

组织委员舒秋溪；

宣传委员王俊亭；

工运委员刘见高（字培誉，阳谷县人，领导县工会）；

青运委员孟广荣，（字化普，东阿县人，领导学生会）；

农运委员王慕桥（领导农民协会）；

妇女委员爻崇僖（雨亭）。

监委会：监察委员杨秀峰（芳亭）。

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陈以莘部到聊城。三月，国民党聊城县党务执、监委员会几个负责人率西南乡农民协会武装进占聊城东关，指挥部设在博聊关小学，提出的政治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聊城士绅们异常恐慌，将四门紧闭，由商会推出蔡干臣出面维持，支应局面，一日三餐宴请县党部几个负责人，时间不久，四门开放。国民党山东省聊城县党务执行委员会设在东门里路南农工银行（即国民党聊城县党部）。

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国民党北伐军到达济南，陈调元督鲁后，省级活动分子王立哉、葛覃、张维中、张丕介、刘子班、李澄之等在济南组织“山东省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

“五三惨案”发生后迁泰安办公，开始重行登记党员，发给新党证。其办法是：党务整理按国民党中央规定的清党案例办理。省委王立哉等七人由中央党部登记审理，发给党证。由上述数人成立了省党部。由省党部登记各县委员，发给党证，成立各县党部。

国民党聊城市党部是由宋志先（黄埔学生）、刘见高、王俊亭、舒秋溪、孙寒光在省党部登记，领得党证后于一九二八年六月来到聊城，成立“中国国民党聊城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孙寒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王俊亭为训练部长；舒秋溪为宣传部长；刘见高兼三师训育主任；宋志先兼二中训育主任；五人主持登记聊城市党员。这五个人都想多登记几个与自己有关系的，排斥与自己不相投的人，大起争执。本来国民党聊城市党部派系林立，有所谓“鲁西大同盟”（丁惟汾派系）、“改组

派”（王乐平派系）、“CC”（二陈派系——陈果夫、陈立夫）、“兰衣社”（复兴社派系）、以及黄埔系等等，结果闹得不可开交。聊城国民党县党部分裂成三派：田谊民（义泰）、王俊亭、舒秋溪为一伙，孙寒光、孙致文（子彬）为一伙，袁盛甫、桑兰亭等又为一伙。矛盾日增，互相揭发，轮番上告，官司打到省指委会。一九二九年春改选县党部时，由于内部分裂，终于导致省委解散了党员群众选举的聊城县党部。

一九二九年秋，王金发匪部逃离聊城后，省党部派宋东岱（常务委员）、薛民、杨屿塘、徐锡哲、周麻子（临清人），带干事孟潇、郑一青等十余人来聊城，组织了“聊城县国民党党务整理委员会”。其中李献吾、薛民（李文斋派），陈焕彩、盖希伯（CC派），都想在三师、二中成立自己的小宗派，均未成

功。

一九三〇年阎冯护汪伐蒋时，宋东岱逃离聊城。同年秋，省委会派湖南人张擎宇为“聊城县党务特派员”，本县人袁盛甫、桑兰亭、倪宗周当干事，整顿建立县党部。不久，张擎宇携款逃走，省又派李献吾、陈焕彩、王昭连、倪宗周等五人为委员，组织整理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陈焕彩接任李献吾的整理委员（常务委员）、倪宗周为训练部长、袁盛甫为宣传部长，刘振洛、王昭连、梁超、齐培栋为委员。但聊城国民党党务工作仍无改变，宗派日多，一直到一九三五年韩复榘停发党务经费，全省各县党部被取消了，聊城县国民党县党部也同时消失。

一九三八年“七七事变”后，田谊民（义泰）以党务特派员名义在鲁西活动，组织县党部（田谊民是王慕桥外甥）。不久，田谊民任

省委委员。他提拔刘子善为聊城市党部书记。刘子善以聊城刘家庙为基地，发展西北乡党员，后来又拉拢李广沐（三青团负责人）与三青团合并。刘子善是三师新制（三三制）一班学生，与王俊亭是同班同学，他的伙伴都是在田道民指导下于抗战八年中新吸收的国民党党员，在抗日中秉承田道民的旨意，破坏国共统一战线，一直坚持顽固立场直到聊城解放。

附：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聊城 城县党部组织情况

张远庆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聊城市党部进驻聊城城内。不久解放军围城，至聊城解放，县党部书记长一直是刘子善。县党部下设四个股：

总务股股长张远庆

干事傅尚志

组训股股长刘金之

干事刘承峨

宣传股股长李秋圃

干事刘昭仁（兼秘

书）

特务股股长杨景绥

干事赵芳珍

其余人员尚有传达室传达长马润身，勤务

钱俊岑、孙儒民，随从王相奎、袁树

林。此外，刘子善的勤务张子安。

县党部附属《东昌报社》的组织情况：

社长刘子善（兼）

编辑赵峻毅

刻板员赵广智

采访员李炳

聊城围城期间城内见闻

耿 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聊城城内驻有日本侵略军近百人、伪军华北治安军第四集团军两个团（原驻三个团，当年六、七月间在阳谷被解放军歼灭一个团）以及驻聊城四乡的赵振华、傅崇鲁、郭培德等伪县大队各中队。由于同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反攻，驻聊日军抽调支援，兵力锐减，不得不由联队换为大队，后又换为中队。防务由伪军代替，执行“以华制华”的政策。伪治安军驻聊司令原为田森，一九四四年换为李洪汉，一九四五年又换为陈××。八月十四日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驻聊日军奉命调回了济南。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当天，伪治安军在城内大街张贴标语，和城关人民群众一道呼口号，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当晚伪治安军的两个团及其他人员，突然悄悄地撤离聊城，向禹城逃遁。八月十六日拂晓，当他们逃到博平韩官屯一带时，被当地伪顽罗兆荣、庞长申部围歼，损失大部；其余人员窜至禹城，后来为解放军全部歼灭。

八月十六日伪治安军逃窜后，聊城城内除伪警察局李洪年的一部分武装和伪县大队的一些岗哨外，没有战斗部队。这时在城东南的伪赵振华部；在候营的伪郭培德部纷纷窜入聊城，以日伪县长石景兰为首和赵振华、郭培德、李同河、傅崇鲁等组成防守部队。当天夜晚，解放军一、七军分区两个团及县区地方武装，在护城河堤外对聊城进行了包围，但没发生激烈战斗，形成了围而不打的局面。

八月十八日傍晚，聊城东关外响了一阵枪声后，打着“山东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牌号的王金祥，由高唐徐官屯（庞长申驻地），率领伪顽王兴邦、高耀南部及伪县长刘伯龙等共约五、六百人进入了聊城。其中王兴邦部约三百人，因收缴了伪治安军两个连的全部武装，战斗力较强。这时加上城内先来的赵振华、郭培德、傅崇鲁等伪顽十八个中队和从堂邑县撤来的李同河、王永安部，以及从莘县撤来的马金壁残部，共有战斗人员三千余人。此时，城外围城的解放军和地方人民武装撤出了外围。

王金祥进聊城后，立即召集赵振华、郭培德等伪顽头目开会商议改编部队。两三天后（约八月二十一日），即将城内所有部队统一番号为山东省保安第四旅（后改为十五旅），下辖三个团。委任赵振华为旅长，郭培德为副旅长。傅崇鲁为一团团长，（下辖三个营），

郭培德兼二团团长（下辖三个营），王兴邦为三团团长（下辖两个营）。另外将高耀南部一百余人和原警察局的警察共约二百余人，并入伪警察局，由高耀南任局长。此外，王金祥还保留五、六十人成立手枪队（又名特务队）。随后又成立了军警联合纠察队，队长为张××，以加强其统治。

八月底，王金祥为欺骗群众，笼络民心，以汉奸罪将日伪县长石景兰、警察局长李洪年、秘书赵建平，承审孙××，以及日伪各科科长等逮捕入狱。九月初，王金祥开会宣布日伪政府秘书赵建平为共产党员，押赴聊城西门外枪决。这时他们一方面在城关清查户口，加强防范；同时在城外附近四周强行拆除对城防有影响的民房，以及其他障碍物，尤其在城外东北角礼拜寺街拆房最多，致使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啼饥号寒，惨不忍睹。另一方

面，派部队出城，到四乡强行抢粮、抓夫，掠夺备战物资，在城关修筑防御工事，以图顽抗。当时国民党聊城县党部紧密配合，积极行动，出版“东昌日报”（编辑周建孚），大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宣传。十月，国民党山东省鲁西党务督察专员田谊民，自济南来聊城。国民党聊城县党部书记长刘子善，组织人员在大街上张贴欢迎标语，大造声势。田谊民在聊城召开了党务人员会议，给他们打气，但迫于形势，不几天就偷偷地溜回济南了。

十一月底，王金祥为了加强守备，巩固城防，又将所属各部重新部署。王金祥兼城防司令，沙耀辰（回民）为参谋长，一团傅崇鲁负责东面及北面，二团郭培德负责西面及南面，三团王兴邦为增援部队。各团、营也作了具体分工。如郭培德团一营负责西面，二营负责南面。各营又按地段划分给连、排、班，加紧构

筑防御工事。

一九四六年元月二日零点左右，人民解放军对聊城进行了四面围攻。那天夜晚，北风凛冽，大雪纷飞，大地积了很厚一层白雪。解放军翻穿棉衣，白里向外，利用地形地物，在城西北角南面，乘城内守军不备，竖梯登城。但是由于事前侦察不细，登城的梯子竖起后离墙头尚差五、六尺，造成奇袭失败。第二次竖梯登城时，为守军发觉，双方发生激烈战斗。不久敌援军赶到，战斗愈发激烈。当晚解放军三次竖梯攻城，均未奏效。战斗一致持续了十三天，由于聊城城墙坚厚，筑有坚固工事，城内伪顽人员多系原齐子修部，思想顽固，当时未能解放聊城。

元月十四日凌晨，战斗仍在进行，此时城内守军已到弹尽援绝的时候。七点左右，由济南方向飞来一架飞机，先在高空盘旋几周后，即

向城内外撒下了“和”字第一号停战命令。大意为：国军围困共军，或共军围困国军，立即停战，各退后六十华里。后面签名的是张治中、叶剑英。双方随即停止战斗。枪声停止后，城头上的顽军和城外的解放军互相交谈或赠送香烟、蔬菜，和平气氛笼罩着城上城下。王金祥知道后，即下令不准伪军人员和解放军交谈，否则以军法论处。自此，解放军长期包围聊城。

一九四六年二月，王金祥为了安定军心，印制了流通券代替法币作为军饷发给士兵。票额有一角、五角、一元、五元等。通令城内工商各界不得拒收，否则以破坏城防论处，以此来解决军费困难。王金祥发行流通券实质是对聊城人民进行经济掠夺。后来王金祥逃窜济南，国民党中央补发了法币数千万元的军饷，王金祥都入了私囊。

聊城在日本投降时，城内除伪军外尚有居民近万人。城内存储各种生活物资和历年积谷三百多万斤。王金祥为了持久顽抗，下令对人民生活各种必需品，诸如粮食、油盐，以及酱菜等均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到一九四六年四、五月时积谷大量霉烂，不能食用，所有牲畜均已宰杀。士兵、群众普遍出现粮荒，居民因饥饿及缺乏青菜，普遍牙龈出血、四肢起黄斑、水肿病流行，死亡人数多至数百人。济南利用飞机空投生活食品，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一九四六年五月初，“国际救济总署”以救济城里居民的名义（实际是向城里伪军运送物资），从济南用十二辆大卡车，满载生活物资，到达聊城城外后被解放军扣留。解放军为拯救百姓，同意居民出城。为此城内派出代表，由士绅周雨亭、陈兰春、刘玉和和解放军协

商。第一批放人是从东门出去的。以后又从北门出去两批，共约五千余人。这时城内居民人数已经很少了，食粮也更为缺乏。伪军乘夜抢劫，掠夺而食，内部发生动摇。王金祥、沙耀辰等提议离城突围逃往济南；傅崇鲁、郭培德等伪顽头目主张困守聊城。最后商议派郭剑秋等五人，利用黑夜偷出聊城去济南求援。

郭剑秋等去济南之后，城内生活更为困难，食粮奇缺。一般士兵每日只能分得少量空投的食品，而居民每天只能吃点霉谷草根充饥。烧柴更无来源，开始是砍树烧，到了六、七月份就拆房扒屋，全城被拆烧的房屋多达数千间。楼西南白衣堂街，原李状元的房屋绝大部分拆光。城内大小树木全部砍伐殆尽。放眼之处，一片瓦砾废墟，居民饥饿致死者不下千余人。起初人死之后，尚有人掩埋，后来饿死屋内无人过问，弃尸街头者累见不鲜，其惨状

目不忍睹。

这期间，城内伪顽曾数次企图出城抢粮，均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未能得逞。九月一天，伪顽头目郭培德亲自率领伪军向西大堤外吕祖庙发起抢夺战，企图向城西抢粮，结果受到重创。在激烈战斗中，郭培德背部受伤，伪军只好龟缩城内，抢粮的幻想被彻底粉碎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解放军开始对聊城发起了四面总攻。战斗一直持续着。二十九日凌晨，双方在东南角魁星楼一带战斗最为激烈。解放军竖梯攻城上来一机枪手，但因后续部队没有跟上，未能攻进城内。从黎明至日出，守城伪军伤亡即达五、六十人。魁星楼原为郭培德团防守，郭负伤后换王兴邦团防守，伪团长王兴邦头部也受了伤。此时城内伪军惊慌万状，斗志涣散，军心动摇。八点左

右，伪军传说济南援军已出发的消息，士气才稍为稳定。

十二月三十日夜晚，城东北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城内伪军见城外没有军事行动，即派人出城侦察，得知解放军已经完全撤离外围。当天下午二时，济南敌援军先头尖兵排打着国民党旗到达东门外，叫城内开城门，但城内仍不敢开。下午三时左右，来了一个团长和城内对了联络信号，城内伪军才开始拆除城门内的障碍物。这时敌援军大部队到达，驻于外围，其主管人员进入城内。王金祥立即召集城内各界有关人员开会，传达当夜十一点前放弃聊城，随援军撤退济南的命令；并令将能携带的文件、衣物全部带走，不能带的档案文件等一律焚烧。十点左右出城时又宣布军政人员及随军家属，任何人不能在途中点火吸

烟等纪律，重伤士兵一律扔掉不管（这些人后来由解放军收容，治好伤后遣散了）。伪军开始慌乱出城，当郭培德团出东门时，有一士兵引火吸烟，被号称“郭家宰房”的屠夫郭培德当时就地砍杀于路旁。

撤退中由援军一个旅为前卫，左、右两翼各有一个旅护卫，另外两个旅为后卫，中间是王金祥的残兵败将保安四旅。伪军人人成了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天明时（一九四七年元月一日），行到广平附近，突然遭到解放军伏击。有的家属在慌乱中竟将怀抱小孩丢弃路旁，所带衣物扔的遍地都是。不久，敌后续部队赶到，济南方面飞来三架飞机掩护，大队才得逃脱。天黑到达茌平，在附近村庄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到达齐河又住了一夜。第三天才到了济南。

自一九四六年元月二日至一九四七年元月

一日，聊城围城一年多的战斗中，伪军死亡营长四人（郭培显、李同河、张宪文、王××）。连长李福德、官振海等七、八人。伪团长郭培德、王兴邦两人受伤，士兵伤亡近一千五百人。

附注：关于济南敌援军来聊的情况：郭剑秋等五人到济南后到处请求，聊城守军也屡次电请救援。济南国民党军政首领王耀武为了保存实力，害怕派出部队会遭到解放军的围歼，而不敢妄动。后来王慕桥、李麓亭、张协三、王相亭等找到田谊民，选派代表到南京找到傅斯年。傅斯年向蒋介石汇报了聊城情况。蒋介石责令王耀武在一九四六年底给聊城解围，王耀武才派了十二军一一一师、山东保安二师（师长聂松溪，聊城军王屯人）以及王耀武的直属特务旅共约二万余人（总共五个旅）接援聊城伪军逃窜济南。

我所知道的聊阳县

李培现

一、聊阳县的建立

一九四七年元旦，我军解放了聊城。解放战争已由防御转入进攻，冀鲁豫边区已成为较巩固的解放区。在新形势下，为了便于领导久受敌伪统治地区各项工作的平衡发展，于五月间，聊阳县应时建立。它隶属于冀鲁豫行署第六专员公署，全县由聊城西南部四个区和阳谷西北部的四个区组成，重新调整划分了八个区。自东向西数：一区驻全营村，二区驻楚庄村，三区驻丁楼村，四区驻白堂村，五区驻王化村，六区驻双楼村，七区驻青杨李村，八区驻郭屯村。县直机关经三次搬迁，最后定驻于沙镇街，直到撤县为止。

聊阳县东邻聊城县，南邻阳谷县，西邻莘县，北邻堂邑县。最长度约为二十五公里，计有三百个自然村，可耕地五十一万余亩，人口十三万有余。

二、机构及人员

1、县委：中共聊阳县委书记李健民。副书记沙晓鲁（女）。

李健民于一九四八年春南下，县委工作由沙晓鲁主持。十月，沙晓鲁南下，由段俊卿任副书记，直至撤县为止。

组织部长：李玉峨

宣传部长：毕玉琦

民运部长：杜竹林

土改部长：沙晓鲁（后提升副书记）

妇联主任：石淑岩

总务科长：王衍森

青年书记：宋来林

2、政府：县长刘泽民，副县长谭启明。
刘泽民于一九四八年元月调走，政府工作由谭启明主持。一九四八年秋，由段俊卿任县长，谭启明调中央党校学习。杨贯一任副县长，至一九四九年春调往北京，袁新斋接任副县长，直至撤县为止。

秘书：孙德祥、刘汝泉（1948年）、秦晓英（1949年）

民政科长：舒新启、于新华（副、1949年）

财政科长：王怀宗（代）、李亦民、窦和卿（1949年）

仓库主任：窦和卿、王崇山（副、1949年）

建设科长：鲍云

总务科长：姜文平（后期兼交通科长）

教育科长：苏韧（女）、赵晓亭（1948年）、郑洪（副）、郑惠民（副、1949年）

司法科长：贾韬

公安局长：王月斋、郑克东（1948年）

武装部长：顾寿增、庞杰（1948年）

战勤指挥：刘杭州

工商局长：袁新斋（对外为工商局长，对内为财经部长）

税务局长：袁新斋（兼）、杨子清（副）

银行行长：袁新斋（兼）、翟教（副）、李文海（副，1949年）

工商科长：周子怡（副）

邮电局长：王正亭

医院院长：王长岭

三、县直机关的迁移

聊阳县领导机关于一九四七年建立于朱台村，该村大体居县中心，村庄较大。随着机关和人员的增多，住房问题增加了困难，于一九四八年初，迁往坡里村。该村有一处德国修建的

天主教堂，约占地三百余亩。大礼堂、办公室、伙房、寝室、浴室、马厩、花园、墓地、道院等各种设施较全，有各式楼房达十余幢之多，为当时鲁西唯一的楼房建筑群。同年夏，冀鲁豫建国学院奉上级指示迁来坡里，县直机关决定迁往孙丰村、庞庄村，一部分经济部门，迁住沙镇街。至一九四八年秋，为了方便工作，除县委仍住孙丰村外，政府各部门全部迁往沙镇街。

沙镇街是全县的最大集镇。居聊城、莘县、堂邑、阳谷之间，交通方便。当时是由津浦铁路的德州、禹城两站，南至黄河渡口杨集，进而到达中原解放区的必经之路，位置十分重要。

该镇在历史上曾是一座古老的武水县城。自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至后周世宗二年（公元955年），划属聊城的三百五十九年

间，可歌可泣的史料多见诸史册。

四、聊阳县做的几项主要工作

在聊阳县建立的两年零四个月中，全国正处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阶段，一切工作都围绕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去进行。其主要工作大体是：

1、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抬担架、送伤病员，在嘉祥、巨野等县战役中，动员人民参战的最多，先后组织担架队达一千五百余付次，均如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2、征收公粮。土改结束后，在发放红契及土地证的基础上，延用“合理负担”的征收政策，全县征收公粮一百二十万斤，分存在十六个村庄。一九四七年采用了埋入地下的储存方法；一九四八年环境好转了，改成了租用民房建库的储存方法。公粮主要是送往前线，支援军队食用。其次用于路过的解放军，再其

次用于党、政、军及教育界的需要。如一九四八年八月济南战役时，由王崇山带领一百二十辆牛马车运往桑梓店公粮十八万余斤；一九四九年四月，由徐永彦带领一百七十辆牛马车往黄河渡口送公粮二十六万斤；同年二季度，正值东北大军南下，路过八区郭屯街，就在该街安置了粮食供应站。同时组织全县人民踊跃地做了军鞋一万余双，及时保证了军需。

3、贯彻土地法大纲，发展生产。一九四八年四月，全县在坡里召开了贯彻土地法大纲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土地改革的胜利，将农民分到的土地通过法律规定，确定地权，颁发红契、土地证。同时发放贷款（人民币）十五万元之多，扶持工农业生产。对于动员全县人民巩固解放区，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安定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4、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革命人才。广泛

发动各村大力恢复及开办教育事业，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做到了村村有小学。计发展小学二百五十处之多，同时还建立了一所聊阳师范学校，为国家培养革命人才，奠定了良好的条件。

5、发展经济工作。当时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本此精神，先发展了一批小型工商业，全县达四百五十余户。同时在沙镇利用古庙会，付以物资交流会的新内容，由工商联出面，组成临时性的办事机构，举办物资交流会。主要成员有工商联主任王鹤清、镇长修金泽、党支部书记修鹤德、市管会主任李培现、市管会财务主管房云阁等。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事前做了充分的有关准备，特别是宣传工作，使参加赶会的商人备好货品，以满足群众的需要。交流会每年春秋各举办一次，两年

共办了四次，每次均有演剧助兴。同时组织教员写了大批黑板报，开展了时事政策宣传工作，不但活跃了农村经济，而且也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

同时加强了银行工作。当时货币工作有些混乱，主要是敌伪印制假票发来我区，破坏我区的货币威信。银行适时抓紧这一问题，加强管理，对假票进行识别销毁。为了便于解放区之间的货币交流，还开展了货币兑换，如北海银行、晋察冀银行、中州银行等地区的货币，按照上级规定的比值来本县兑换，均以人民币为标准，以解决统一货币问题，为逐步发放人民币打下了基础。

一九四九年八月，全国即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随着形势的发展，聊阳县建制宣布撤消。所辖各区分别划归原属各县。各区的干部，一律不动，随区划归属各县。宣

布结束时，由袁新斋副县长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当场拍照了七十三人的合影留念。至此聊阳县（一九四七年五月——一九四九年八月）完成了历史使命，全县干部除已调到新的岗位任职外，其余一律集中到专署，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参加了国庆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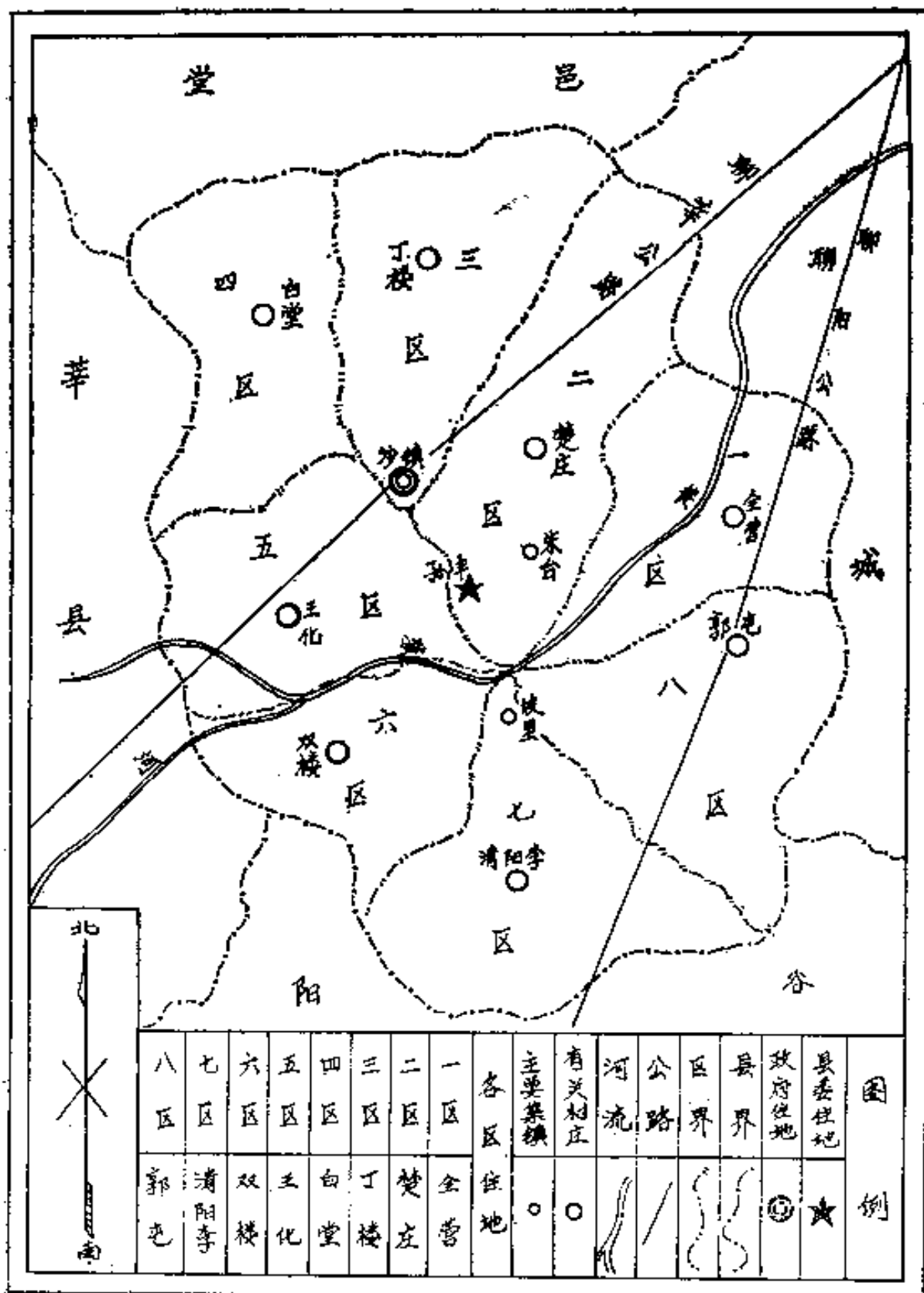
- 附： 1、聊阳县区委书记、区长一览表
2、聊阳县行政区划地图

附：1

聊阳县区委书记、区长一览表

区别	住地	职务	姓 名				备 注
一	全 营	书记	王继唐	王景武			
		区长	宋培恩	李岷泉	刘延年		
二	楚 庄	书记	杜仲文	尹祚祯			
		区长	于继之	宋耀庭	孙子元		
三	丁 楼	书记	张宗谦	刘汝新	孙瑞民	孟鲁光	孟鲁光同志 先任区长后 任书记
		区长	王宜斋	孟鲁光	刘真民		
四	白 堂	书记	庞 杰	姬汉卿			
		区长	孟继禹	肖 侠	裴惠民	谭古增	
五	王 化	书记	柴 龙	孙 锐			
		区长	李海峰	郭毅然			
六	双 楼	书记	王东瑞	张仲生	庞金星		
		区长	王清岑				
七	青杨李	书记	刘汝泉	杨 胜			
		区长	池燕南	张庆平			
八	郭 屯	书记	李 英				
		区长	姜学庆				
说 明	<p>1、各区的书记，当时通称指导员；</p> <p>2、当时的干部，升调比较频繁，有的任职月余就有变化；</p> <p>3、因时间较长，有的干部姓名难免有遗漏，请知情同志补正。</p>						

聊阳县示意图



鲁西北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王其彦

抗战初期，中共鲁西北党组织和范筑先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上“堪称典范”。我综述看到的史料，谈谈它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

中共中央在极端困难的长征路上，一方面被迫和前堵后追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作战，一方面为了救国救民，在1935年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从而正式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政策。此后，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念旧恶，对国民党做了大量的争取团结工作。

在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为了争取团结范筑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东省第六专署工作的共产党员赵伊坪和进步青年张维翰，早在彭雪枫来聊城前，利用私人关系，就对范筑先做了些思想工作，向范介绍了一些进步书刊，使他倾向同情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张维翰是原西北军十三军军长张维玺的胞弟，范筑先曾是张维玺的高级参议。这时，张维翰在范的手下工作，又都是山东省馆陶县南彦寺村庄人。因此，张维翰和范筑先的关系特别密切。中共鲁西北党组织充分利用了这个好条件。

在建立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中共中央非常关心鲁西北的统战工作。1937年

5月，周恩来派彭雪枫到聊城做中共鲁西北党组织与范筑先的统战工作。彭雪枫在同学张维翰的陪同下，与在专署工作的原北平育德学校的同学赵伊坪、牛连文等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彭雪枫认为“日寇已下了灭亡中国的决心，只有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注1）。彭雪枫指出：鲁西北处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现在最重要的是对范筑先做好工作，争取他与我党合作，发动鲁西北人民抗战。要聊城的同志停止反对何思源的运动，“把主要目标对准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对范筑先也做了分析，认为范是民族爱国主义者，为人正直廉洁，对国民党投降卖国不满，对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表示十分钦佩。我们和他的关系密切，易于接近做工作。彭雪枫在聊城，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

于统战的指示，给在专署工作的共产党员很大鼓舞和教育，使他们明确了斗争方向，对以后发动群众，团结范筑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彭雪枫在聊城住了七天，除部署指导鲁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外，还帮助1927年的老党员，因党组织遭破坏，而失掉党的关系的赵伊坪恢复了党的关系，还介绍张维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争取团结范筑先，彭雪枫离聊赴太原后，由张维翰把彭雪枫来聊的情况，在聊城讲的问题，都向范筑先做了详细汇报。范筑先一方面点头称赞说：“共产党的这一套主张很对，不用红军的战法是不能打败日本。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不能得到拯救”（注2）当时就埋怨说：“红军代表来了，为什么对我保密？自作主张？”。张维翰作了客观的正确

解释。并说，中日战争一起，我们马上可以和他联系。范筑先心照不宣地微笑点头，表示同意。这是中共鲁西北党组织第一次直接与范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是富有成果的。从此以后，赵伊坪、张维翰在六专区与范筑先的关系，可以说就是中共鲁西北党组织和范的关系了。

“七·七”事变后，应党中央代表彭雪枫之邀，赵伊坪去太原，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发动全国抗日的方针和毛泽东对临近战区的人民开展游击战争，阻止敌人进攻的指示，并带回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随后，彭雪枫又派张震到济南，经原北平育德学校的校长余心清介绍，会见了韩复榘。张震向韩讲述了中共中央联络各地实力派一致抗日的方针。经人推荐，冯玉祥的高级幕僚、倾向抗日的余心清，出任山东省政训处处长，进

步军官王致远任副处长，原北平育德学校的学生赵伊坪、路庭训、吴清海等也在政训处工作。这就为争取团结范筑先，在省里奠定了组织基础。

1937年8月初，冯玉祥出任津浦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当时，在济南津浦宾馆住着几个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张维翰和老乡王化云去看望他们。他们对抗战形势的认识和张、王的观点基本一致。张维翰和赵伊坪等研究，范筑先和他们有友好的同僚关系，可以通过他们来进一步统一范对抗战形势的认识，以便今后更好地做范的争取团结工作。经省委同意，张维翰用电话邀请范到济南津浦宾馆会见老朋友，座谈抗战形势。经过座谈，大家的共同认识是：

“我们都是鲁西北的人，决不能离开鲁西北，随国民党队伍南逃。我们一定要坚决留在自己家乡，和日寇血战到底”（注3）。大家还认

为，要保卫自己的家乡，取得全国抗战的胜利，只有取得共产党的领导。这次座谈会，使范筑先在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当时就委派张维翰、王化云“在济南聘请共产党到鲁西北协同抗战”（注4）。这是范筑先将军明确地表示要与共产党共同抗日救国。山东省委为了答应范筑先的要求，立即派去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姚以介的儿子共产党员姚第鸿。姚以介与范筑先有旧谊，范筑先委任姚第鸿为专署秘书。随后陆续派来一些共产党员和大批民先队员。因此说，济南津浦宾馆座谈会，标志着中共鲁西北党组织和范筑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二

1937年9月中旬，日寇逼近山东。10月初，日寇占领了德州，侵入鲁北。是时，范筑先急忙派张维翰再去济南聘请共产党员到聊城协同

抗战。张维翰通过山东省委，聘请了十二个共产党员到聊城任干事。张维翰在济南期间，正值聊城为了适应抗战体制，将第六区和保安司令部合并成为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范筑先任司令，王金祥任参谋长。在山东省委的帮助下，由国民党山东省政训处直接委任共产党员张维翰为六区政训处主任。政训处的其他成员也多是共产党员，从而使六区政训处成为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统一组织形式。正如张维翰说：政训处“对外是第六区的一个行政机构，对内是我党鲁西北特委领导抗战的办事机关”（注5）。1939年11月2日的《鲁西区党委统战工作报告》也说：政训处“成了团结各党各派进步青年的中心领导机关”（注6）。中共鲁西北党组织通过政训处这个合法组织来领导鲁西北的抗战工作。张维翰为主任的政训处的成立，标志着鲁西北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在组织上巩固起来。

10月中旬，日寇占领了高唐。范筑先接到韩复榘南撤的命令。临清的赵专员经聊城，已由东阿过黄河了，鲁西北情况已经混乱。范筑先决定：把全体人员撤到黄河渡口齐河县官庄坐看形势。张维翰在这严峻的时刻，心想：

“党给我们的任务，要争取范筑先坚持华北抗战，现在范要撤走了，我们怎样对得起党，对得起鲁西北人民”（注7）。张维翰经过冷静的考虑，坚定地对范说：“你走吧！我坚决不走！”。张维翰等共产党员率领自愿留下抗战的四十二人守聊城，在鲁西北打游击。这一壮举使范筑先很受感动。当范离开聊城时，给政训处人员讲话说：“我已年老无为，同时奉命退去，没有办法，中华民族的解放，只有放在你们青年身上了……”（注8）。

范筑先走后的当夜，齐子修带领的一连败

兵，骗开聊城城门，把聊城抢劫一空。10月18日，张维翰被迫只身骑着自行车到齐河官庄，向范筑先汇报情况，并建议范回师聊城。范筑先倾听了张维翰的汇报和建议后，脸色抑郁，心情沉重。沉默了一会，范筑先决心当天晚上七时，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维翰、姚第鸿以及专署和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经过尖锐热烈地讨论，范筑先最后下结论说：“我们是国家委派的官吏，守土有责，未经抵抗就抛弃老百姓撤走是错误的。我决心留在黄河北守土抗战，愿随我回去的就留下，不愿回去的就渡河南退，决不勉强”（注9）。范筑先通过电话向韩复榘作了汇报。时值宋哲元率第一集团军经过鲁西北反攻石家庄，韩复榘就答应了范筑先回到鲁西北坚持抗战。范回到聊城，安抚民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从而使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范筑先回到聊城后，接连取得梁水镇、柳林两次对日作战的胜利，“兴奋了鲁西北的民众，打击了汉奸们的亡国理论。范的威信是大大的提高了”。

中共山东省委为了加强对鲁西北抗战的领导，在范筑先回聊后，即派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为驻聊城的省委代表，公开职务是政训处秘书(注¹⁰)。随后又派来红军干部洪涛、王幼平，金维国等，并把中共鲁西特委改建为鲁西北特委。

1937年9月下旬，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与日军作战中，取得一系列胜利，特别是平型关大捷，振奋了全国，国共两党的军队在山西北部联合作战，影响深广。在这样的形势下，范筑先与共产党合作抗战，也就大胆了。1937年11月初，日军进攻大名，济南吃紧。韩复榘又命令各

专员、各县长率众退却。在这关键时刻，张霖之通过张维翰、姚第鸿给范筑先分析形势，在政治上推动范，激发范，坚定范的抗战决心。张维翰和姚第鸿向范筑先坚决表示：“我们誓死坚持鲁西北的抗战，愿与鲁西北共存亡”。范倍受感动和激发，毅然向全国发表了决心坚持鲁西北抗战的通电。电文说：“慨自倭奴入寇，陷我华北，铁蹄所至，版图易色……哀我民众，胥陷水火，午夜徬徨，泣血椎心。筑先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辞……”11月20日，在全国各大报上都发表了“范筑先通电全国誓死留在鲁西北抗战，坚决不退黄河南”的消息。在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向南溃退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专员，竟留在敌后抗战，给全国人民很大鼓舞和振

奋。因此说，通电的发表，标志着中共鲁西北党组织和范筑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得到巩固。

与此同时，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到河北省南宫一带，因与鲁西北毗邻，给鲁西北广大军民又一振奋和鼓舞。当时，鲁西北的民团、伪军和土匪武装，纷纷要求范筑先收编。中共鲁西北党组织也创建多支游击队。范筑先的势力范围，最盛时，不仅包括四、六两区，还包括黄河两岸的一、二两个地区。鲁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由于鲁西北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和嫉视。1938年3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派胡学仁到鲁西北“视察”。胡学仁“视察”后，向沈鸿烈报告说：“范筑先与中共合作，发动群众，收编支队，野心不小，山东已经红了半个

天”（注11）。3月底，沈鸿烈电邀范筑先到曹县，查问范筑先收容了多少左倾青年。此后，沈鸿烈及其爪牙，对鲁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处造谣、污蔑，进行破坏。因此，李宗仁曾来电查问范筑先：黄河以北有多少八路军？共产党送多少学生到聊城。这样就给鲁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埋伏下了隐患。

范筑先拒绝韩复榘南撤的乱命，留在鲁西北抗战，但对能否取得抗战胜利还有怀疑。为了解决范的上述问题，进一步巩固与范的统一战线，中共鲁西特委以商讨和八路军联防为名，建议范在1938年6月中旬，到威县会见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在威县范筑先将军受到徐向前副师长和广大军民的列队欢迎。

范筑先的这次威县之行，使范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使范及时学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光辉战略思想，受到了很大启发，坚定

了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

1938年9月下旬，范筑先参加了在南宫召开的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这个会议是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瑞、冀南行署主任宋任穷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召开的会议。这时，鹿钟麟、沈鸿烈已经接到蒋介石的反共命令，妄图把八路军挤出冀南，并强行改编范部。范筑先坚定地站在中共一方，义正词严地抨击了鹿、沈两个顽固派，对八路军冀南军区首长徐向前、朱瑞、宋任穷则表示非常尊敬。范在南宫期间，参观了八路军部队建设，并向徐、朱、宋请教了关于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整编军队、坚持长期抗战等问题，使范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南宫会议后，张霖之为了贯彻南宫会议精神，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的原则，以六区政治部（1938年5月由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山东省第六专区抗战行动纲领》，在1938年10月5日召开的第六区军政联席会议上通过。范筑先在会上讲话时说：“这次大会通过了《抗战行动纲领》……大家应共同遵守”（注12）。从此以后，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共同纲领。中共鲁西北党组织与范筑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来。

随着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鲁西北的抗战力量逐步聚集、发展和壮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群众的抗日活动得到较好的发动，群众生活得到一些改善，军队发展到三十五个支队和三路民军，计六万人。中共鲁西北党组织发展到七千至八千党员，开创了轰轰烈烈的抗战局面。

注：

(1) (2) (3) (4) (5) (7) (9) (10)
(11) (12) 《聊城地区党史资料》，1983年第2期、第
13页、14页、20页、73页、37页、22页、37页、29至30页、
179页、67页。

(6) (8) 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华北敌后——鲁西北》第44页、39页

回忆山东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

邓愧余

山东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原为东昌府立初级师范学堂附属小学，成立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1914年（民国三年）改为三师附小，1933年后再改为山东省立聊城师范附属小学，座落在聊城城内司马街（又称“二府街”，今新华广场），是鲁西唯一的一所省立完全小学。当时在师资力量、教学设备和教育质量上均显著地高于一般县立小学，是人们所钟爱、所向往的一所学校。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如邢凯丰（原名姜扶辰），鲁西良（张凝，原名张子纯），金灿然等教育影响下，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在反对封

建迷信、反对日寇侵略和抵制日货等革命运动中，是追随三师、二中的一支生力军，我市知名的烈士、优秀共产党员金方昌、邓延熙（白果）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从目前小学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个学校至今仍有不少地方是值得借鉴的。

一、学校布局科学合理、优美

典雅，给学生以良好的学习环境

学校设于聊城城内司马街东首路北，其主体结构分为东、西两部分。

西边临街瓦房五间，青瓦粉墙，庄严古朴。中为校门，门的上方书有“山东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校”，鲜明醒目，两旁各两间为传达室和接待室。进门后，在宽阔的青砖甬路两侧是花圃，奇花争艳，清香扑鼻。学生一进校门，在小小心灵里便产生一种美的感受，从

而感到学校之可爱。

第二栋也是瓦房五间，两边为教务、训育、总务主任室，中间通道，墙上镶有大玻璃镜。学生走过，首先检查自己是否仪容端正、衣冠齐整，以培养学生讲卫生、讲文明的良好习惯。

通过小天井，正中便是主任（校长）室和办公室。学生走到这里不禁肃然起敬，安下心来向东走向操场校园。主任室后是大花坛，西为图书馆，北为女教师宿舍。

后面便是幼稚园、大教室。前有浪船、秋千、压板和滑梯各一。幼稚园小朋友在这里唱歌游戏。这里不仅是儿童学习知识的场所，而且也是一个小小的儿童乐园。

东部是操场校园，大操场设网球、排球、篮球场以及供中、高年级学生游戏的秋千、压板和滑梯。

操场东面是大礼堂、音乐室和体育器械室。北面是两排教室，每排四座十二间。中间通道墙上贴有壁报和“大同市政府”（学生会）布告，操场南面是一排教师宿舍，来客一般不能进入校园。因此，上课时全院肃静无声，下课后操场一片欢腾，整个校园生气勃勃。

再后，北院便是伙房，茶炉和学生宿舍。

这样布局科学合理，优美典雅，对培养学生精神文明和学习情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二、在教育 and 教学上有一套新颖的、比较先进的方法

学校校长由师范校长兼任。附小设主任一人，主持校务工作并兼任师范本部教育课，参

加师范校务会议。这样，既加强了附小与师范本部的联系，而且可以将小学的教育经验充实到师范教育课中去，并便于指导师范学生对附小学生的教育实习。下设教务、训育、总务三处，各有主任一人。主任人选要求严格，如担任学校主任的王鸣銮（王韵焯）、周子山及教务、训育主任马骥才、付茂勳、李绍岩、朱彦青等，均系大学毕业、素孚众望的学者。他们治学谨严、教育有方，深得师生和家长的爱戴。

学校的教育形式主要是课堂教学。在课程安排上，一、二年级为低年级，开设国语、算术、美工、唱游等课，三、四年级为中年级，增设公民及常识课，并将美工分设美术、劳作两科，唱游分设音乐、体育两科，五、六年级为高年级，再增设自然、地理和历史课，取代常识课程。

教师已不热衷于“填鸭式”教学方法，除采用所谓“引起动机，决定目的”的陈旧教学方法外，注意了利用实物和挂图进行直观教学。国语课讲到戏剧或人物对话较多的教材时，老师常让男、女同学分别充当角色进行朗诵。特别是朱彦青老师的地理教学，至今使我们记忆犹新。他讲到每个国家、每个行省，信手便能在黑板上画出地图来。并给它们起了有趣的名称。如中国地图是“海棠叶”、江苏地图是“老头作揖”等，形象显明，学生易学易记。考试也让学生画图、填图，教得生动活泼。我们学生至今谈起仍是赞口不绝。

课堂教学不仅注重文化课，而且非常注重美工教学。低年级画蜡笔、铅笔画，作折纸贴花的手工。中年级用彩笔、铅笔写生、素描，编织毛线和做纸工、泥工，到高年级便开始学国画，做比较复杂的竹工、纸工，如用竹做笔

筒，並在上面刻花刻字，用銅板紙做房屋和家俱模型等，在這方面比現在小學是豐富多彩的。

國語教師兼任“級任”，除負責教管本班學生外，每天還要批改大量的作業，從而了解學生各方面的情況。從二年級開始，學生每天寫日記。日記簿是學校自己設計印刷的。各年級格式不同。低年級除印有月、日外，還印有太陽、雲朵、雨傘等圖像，讓小學生關心天氣並感到有趣，從小養成寫日記的習慣。這樣，高年級學生便能寫數百字的日記了。當然，學生也有寫“今日無事可記”和“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一天天地過去了”等一套公式話來應付老師。但是，從小培養學生寫日記的習慣，提高學生的寫作水平，還是應當提倡的。

從二年級開始，學生便寫毛筆字。根據印

刷格式的不同，学生从描红、影写到临贴，每天最少写一张大仿，四行小字。此外，每周学生还有课堂作文一篇。教师批改作业的任务是繁重的，但是这对督促学生学习，检查学生学习成绩，了解学生情况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老师在这方面也有讨懒的。如批作文总是“明白”、“通顺”、“尚佳”等等，有人笑话老师说，作文里写“小放牛”也不知道，还有的老师让学生帮助批改作业等等。

学校当局注意到搞好课堂教学的关键在教师，因此，每年除在三师毕业的“高材生”中选拔外，还聘任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如张子纯老师文学修养很高，经常在鲁迅办的刊物《语丝》、《北斗》上发表文章；郭子祥老师是擅画仕女、国画造诣很高的美术教师。此外，如程省三、张景颢、刘九铭、庄肖颜、肖以仁、姜扶辰、丁子新、金灿然，女教师杨席之、孙

秋岩、王秉田、顾慧卿、张冰如等都是学有专长、富有经验的老师。当然，附小教师待遇也是较高的。县立小学教师月薪最高的二十八元，附小教师一般则是四十二元。在当时一个学生每月仅三元钱的伙食费来说，这种待遇不能算低了。

最令人奇怪的是，教师每月考试将成绩列表公布，是用五个小格表示的：用红直线画满五格是一百分，四格是八十分，三格是六十分；用黑直线画两格或一格的，是不及格或最劣的了。这与苏联五级分制记分法何其相似！

除公民课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外，每星期一学生要填写品行测验表。表上印有二、三十条，如“你饭后洗手吗？”“你上班认真听讲吗？”“你每天按时完成作业吗？”等等，符合要求的在括号内划“+”号，否则划“-”号。这样，经常提醒学生应怎么做，对教育学

生遵守纪律，培养学生良好习惯是大有好处的。

每星期一上午，有一节“纪念周”，全校在大礼堂集会，会议程序是：一、开会；二、唱国歌；三、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四、默哀三分钟；五、恭读总理遗嘱；六、主席报告开会宗旨；七、自由讲话；八、礼成。在“五·三”、“五·卅”、“九·一八”等纪念日召开国耻纪念会。师生在会上痛斥日寇侵略，残杀同胞，有时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激发学生誓雪国耻的决心。

每星期六下午在大礼堂集会。内容多种多样，有演讲会、游艺会。推行“学习周”、“纪律周”、“卫生周”等竞赛，在会上评奖发奖。奖牌是美术老师用薄板画上图案雕刻而成的。得奖班级挂在黑板旁边，学生都感到无上光荣；但如下次评不上，就得摘掉，亲自送

给得奖的班级，以激励学生争取优胜、保持优胜、爱护集体荣誉的精神。

三、开展多样活动，增长学生才干

学生会组织称为“大同市政府”，由学生担任主席和委员，实行学生自治。学生办有“小小合作社”，由学生入股，自己经营，各班选出服务员在课外活动营业，出售笔墨纸张、本子等文具用品，每学期末公布帐目，按股分红。

每月出版《儿童园地》一册。文章由学生投稿，老师审阅、定稿和付印，16开铅印，彩色封面，印刷精美，深为学生喜爱。记得曾出“新年号”和“民歌民谣”增刊，每期达百页。这个刊物除赠作者一本作为稿酬外，在学校内部发行。

学生成立雅乐组、舞蹈组、武术队及各类球队，每天按时活动。每学期还开一次运动

会。

学年开始，由学生布置教室，剪贴彩花，用彩色绉纹纸做成各种花样，拉到墙上，真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墙上由学生自写标语格言，如“有志者事竟成”，“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等，用以自勉。

每学期末，特别是新年，召开盛大的“家长恳亲会”。校门悬灯结彩，校园五彩缤纷。家长到各教室参观学生成绩展览会后，再到大礼堂开会，观看学生表演“精采”的文艺节目。不仅学生家长放心满意，而且也博得社会的赞扬。

山东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至1937年“七·七”事变，共招收学生一至二十二级；1938年，范筑先将军在此基础上开办抗日小学，同年11月16日聊城被日寇占领，便自行解体了。

办学近三十年，对聊城教育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在办学方向，培养目标和教育方式上有不少是落后的。在教育方式上体罚是严重的。教师对学习好的学生有所偏爱，称之为“爱徒”；而对学习不好和挑皮的学生打手心、揍屁股是常有的，扭耳朵、罚站更是司空见惯的了。

今天我们反思过去的小学教育，应当吸取精华，扬弃糟粕，把我们社会主义的小学教育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台阶，为振兴我市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稿

我对私立文德小学的回憶

周乐亭

一九二九年秋，我进入聊城圣公会私立文德小学，插班在三年级就读。那时用的名字是周凤翔。文德小学位于聊城东关运河闸口南面的太平街南侧，校门朝北，进校门是一个大操场，操场右（西）面，北部是一个大院，内为课堂、男生宿舍及单杠等。南端有一个小院，内有女子宿舍及女子食堂。操场的左（东）面，有三个小院，北院是大礼堂，中院是教会会长席永清等人的宿舍，南院是男生宿舍。在操场的东南角，有一座男生食堂。

文德小学的课程及使用的课本与一般小学相同，只是从五年级起，加一门英语。课外宗教活动多：（一）饭前祷告，每日三餐饭菜摆

好之后，我们（住校生）就位站立，桌长先领唱四句圣诗，再念祷告辞，念毕，大家同声说：“阿门！”（意思是但愿如此）然后坐下吃饭。

（二）做礼拜：每星期日的上午，凡住校生不论信教与否，都要到礼拜堂内做礼拜。礼拜堂在太平路北侧教会大院内，门朝东，进门后，有一通道通往西端的高台（相当于一般礼堂的主席台）。通道的左右两侧各放列许多条长凳，每条凳子的前面放置几个红色布垫子，做礼拜时，席会长和受过洗礼的教职员在台上，我们学生在台下，礼拜仪式由席会长主持，他时而讲圣经（新约全书），时而唱诗，时而祷告，时而站立，时而坐下，时而跪下。我们随着席会长的姿态站立、坐下、跪在垫子上。做完礼拜（大约一小时左右），然后放假。

（三）过圣诞节：每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圣诞节（耶稣诞生的日子）。有一年圣诞节，天刚黎明，就来了一小队女生，在我们男生宿舍的窗子外面唱诗，向我们祝贺，我们也排成队到女生宿舍的大门外唱诗回礼（学校规定，男生不得进入女生宿舍）。上午在礼拜堂内举行庆祝活动，下午在大礼堂开恳亲会（由教会和学校邀请信教的家长和优秀学生的家长参加）。晚上大联欢，由我们学生演出话剧。

（四）接主教：每逢山东省圣公会主教英国人史多玛来聊城视察时，教会和学校都隆重举行迎接仪式。在他预定到达的前几天，教师就对我们布置欢迎他的程序、重要意义及注意事项等，并要求我们把课堂、宿舍、院落及操场等处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九二八年夏，冯玉祥将军统率的国民革

命军（北伐军）赶走了作恶多端的张宗昌的北洋军，进驻聊城。北伐军在大街上列队行进，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的革命歌曲；张贴“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在城内万寿观的大戏台前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三民主义，并演出《破镜重圆》等话剧（当时叫文明戏）。全城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这种新气象，很快由哈唤文（文灿）、杜星垣等青年教师带到文德小学里来。他们来后，增开了三民主义的课程；每星期一上午在礼堂举行一次总理（孙中山）纪念周。其程序是：（一）全体肃立；（二）向总理遗像三鞠躬；（三）敬默三分钟；（四）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全体循声朗诵；（五）礼成。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逝

世四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县里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上午，我校师生整队到万寿观广场参加纪念大会。会后和其它学校一齐游行，经东关大街到闸口桥，沿途呼口号，唱革命歌曲，威武雄壮。下午，到郊外植树（这一天是为纪念孙中山制定的植树节）。晚上，举行提灯大会。我校学生每人手持灯笼，整队到万寿观广场集合后，经东关大街游行到闸口结束。由于学生扎的灯笼形状、色彩各不相同，游行时就象一个五光十彩的火龙在飞舞。

此后，每逢植树节、清明节，学校分别举行植树、踏青等活动。还请省立第二中学的体育教师梁伯河先生来校表演单杠技巧。国文教师杜星垣在上课时，有时把蒋光慈的新诗写在黑板上朗诵。其中一首名《红笑》，给我的印象最深，至今我还记的诗中的一些词句：“艰难的路程已经走了，危险的关头已经过了！一

大些白祸的恐慌，现在却变成了红色的巧笑了……。那里是太平洋么？那么样的乌烟瘴气！那不是莫斯科么？多少年梦见的情人，我快要同你拥抱哩！”逐渐地饭前不做祈祷了，星期日也可以不做礼拜了。革命的气息，代替了以往的宗教气氛。

一九三一年春，县教育局指令文德小学立案，教会拖延不去办理。教育局声称，如不立案，则其毕业生，不能报考省立中学。我是当年应届毕业生，对此甚为关怀，所以希望早日立案。四月三十日的晚上，我班年纪较大，在学生中有影响的肖国兴对我说：“我们眼看就要毕业了，如学校再不立案，我们升学就没有希望了。为了迫使教会早日去立案，今天晚上我们要采取行动，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

大约五月一日的零时左右，我们五、六年级的部分男生，悄悄地起了床，到大操场的西

北角集合，由肖国兴分发给每人一支木棒。我们分成两路走到席会长住的小院外面，一面高喊：“打倒洋奴！”、“我们要求立案！”等口号，一面用木棒敲打小院的西门和后墙。我们喊了一会，不见有人出来，就回宿舍睡觉去了。

事后，教育局出面调解，希望尽快立案，以免学潮再起。教会方面答应立案，但提出要开除带头闹事的肖国兴等几个学生。並说这次闹事发生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可能与共产党有关。哈唤文等教师，据理力争，坚持一个学生也不能开除，否则他们都辞职。争论的最后结果是：（一）文德小学到教育局去立案；（二）不开除学生；哈唤文等教师去职。

学校恢复了平静，但我们爱戴与尊敬的哈唤文等教师再也看不见了。夏末，我们按时毕业，秋初，我们去报考省立第二中学。我有幸

被录取，編入十二級三班。此后，我又到文德小学去了几次，打听哈唤文等教师的下落，但谁也不知道。只听说，哈老师等为了不让开除一个学生，承担了闹学潮的责任，说闹事是他们授意的。

光阴似箭。转眼间，五十五年过去了，但在文德小学就读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直到今天，我仍然怀念和感谢把革命思潮带进文德小学并代我们受过的哈唤文、杜星垣等老师；怀念我的同班肖国兴、周德元、邹文英、邱友贞等同学。（注）

注：抗日战争爆发后，肖国兴和周德元皆参加了范筑先将军的抗日军。

东临道道立模范小学

胡国典供稿

民国初年，东昌府改为东临道，设道尹公署，辖十三县。民国二年（1913年），由首任道尹龚××倡议创办了一所初具规模的小学——道立模范小学。继任道尹周树标又对该校进行扩建，增加经费，添置教具，委任得力校长，延聘当地有名望的教员，使学校日臻完善。1927年北伐后，东临道撤销，该校改为县立第二高等小学。道立模范小学从创办到易名，存在时间前后长达十四年。

道立模范小学的校址，在聊城旧城内西北隅，道尹公署东邻，即今专粮局院址。

道立模范小学开办十四年间，更易过两任

校长，即于东洲和李成之。于任期较短。李成之，字信斋，聊城沙镇南糖坊人，为清末庠生，后考入山东省优级师范（相当师专），是地方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在该校任教的也多是富有教学经验资历较深的教员，如：栾文甫、宁纯吉、庄肖颜、任光福、李慎吾、李莲池、孙达臣、胡捷斋、叶雨臣、周玉珊，以及女教员刁桂兰、孙秀一等。

学校设有两个高级班，四个初级班，皆为单式。此外尚有一女子部（复式班）和蒙养园（即幼儿园）。

学校校院方园有数十亩。校门座北朝南，门内两侧有传达室和接待室。向内不远有十余间新式房舍，两头为校长室和教员住室，中间为会议室。顺此向北，是约有三、四亩大的校花园，周围木桩铁丝圈围，园内栽满花木。以花园为中心，园东有一假山，山上筑有凉亭，颇

为雅致宁静。园北是可容纳数百人的礼堂，再北是蒙养园。园西是操场，场地相当宽敞，有篮球、网球、单双杠、木马等场地，还有供幼儿游戏的铁环、哑铃、滑板、跳绳等设施，冬天还开展踢毽子的活动，每年春季都要和山师附小、卫仓小学等在这里联合举行运动会。操场北面是几排宽敞明亮的教室，还有教员上课前的准备室，学生的游艺室、图书室等。

当时小学学制是六年制，即高级二年，初级四年，也称二四制。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同现在的政治课），高年级还有史地、自然、音体美、英语（英语模范课本）。

当时教师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课堂秩序不错，学校与学生家长的关系也很融洽。每年都要召开一次“恳亲会”，即家长会。开会期间把学生的学习成绩展览出来让家长检阅，校方向家长介绍学生的操行学习情况，并征求

家长对学校的意见。当时高年级的学生多来自乡村，为了解决学生的食宿困难，学校建有学生宿舍、伙房，大大方便了学生。

学校当局也比较开明，多数教员的思想热爱祖国倾向革命。记得1925年2月13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到学校，全体教师当即齐集大礼堂举行追悼会。这在当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进步表现。

不过那时学校也有不少弊端，一是对学生实行体罚。稍有不轨，轻则罚站，重则挨鞭。二是存有封建等级观念。当时有两名校工（乔贵、吕鸿恩），他们见了校长教员必恭必敬，称校长“老爷”，称教员“师爷”，而校长教员对他们则直呼其名。当然不唯模范小学，旧式学校大都如此。

聊城四大书庄

金紫垣、胡国典、刘伯纪

聊城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向为鲁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木板书、毛笔是聊城历史上出名的行业，而木板书行业中，有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四大书庄。

聊城木板书的历史，始于明洪武初年。朝廷当局为扭转鲁西一带因天灾人祸，农田荒芜，人口稀少的局势，采取了移民措施，从晋南迁来了大批居民。当时晋南平阳府（临汾）印刷业发达，不少印刷和雕板的技工匠匠们也随之迁往堂邑（原为县，1956年归聊城县）农村的较多。其分布范围，西至冠县贾镇，北至辛集，南至定远寨。明代聊城为东昌府治所在

地，堂邑为东昌府所辖，距聊城仅40华里，往返十分方便。不少人刻印启蒙读物和通俗读物来聊城串卖，颇为畅销，因而明代聊城即出现了一些小型木板书作坊，“好友堂”是最早出现的一家。它虽只印卖启蒙读物、通俗读物、唱本之类，但却打开了聊城木板书行业的大门，成为聊城木板书庄的首创者。到了清代，聊城更加繁荣，康、乾年间，已达鼎盛时期。各地巨商大贾，云集聊城。“御赐免税碑”使聊城享有特权，更促使外地客商来聊城谋利。他们在聊城运河沿岸建有“山陕”、“苏州”、“武林”、“江西”等多处会馆。运河船只，来往穿梭，有“崇武连樯”之景。与此同时，聊城文运大开，书院满城。鸿儒相卿，翩鹊而起。聊城有状元两名，进士五十四名，举人一百五十余名，“任、邓、朱、付、耿”五大家均为在朝高官，杨氏“海源阁藏书”，闻

名中外。这些都是聊城木板书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因而聊城木板书业蓬勃兴起。聊城“四大书庄”相继开业，小书坊蜂拥而上，小书摊、贩更不计其数，书、笔两行，一跃成为聊城的主要行业。

聊城最大的木板书坊是书业德。开业于清代盛期康熙年间，资东为山西灵石县人，姓郭。地址在东门里大街路南（今新华商场处），院落宽广，为明代吏部尚书许赞故居。后院有百余间房子，分别为客厅、仓库、作坊、宿舍等。临街五间门面，另有大门，对联写着“书藏二酉；业积三多”。书业德资本雄厚，书板达千余种，在纸张、印刷、装订等各方面都十分讲究。特别在校对上更为重视，专设校勘先生五、六名，雕刻工七八人，负责校对，改补工作。所以书业德的书错字极少，雕板精良、字画清晰。因而经营范围日益扩大，生意兴隆。

据其末侄经理陈继先（山西祁县人）说，当年的书业德，最兴隆时有职工百余人。除聊城总号外，还在太原、祁县、忻县、介休、中遥及山东济南等地设有十多个分号和代销处，大量推销其书。书业德的木板书行销于京津、张家口、绥远、晋、冀、鲁、豫、东北三省，上海、南京以及徐州、宿县等地。由于销路广、销量大，一年到头，无时不忙。特别每年腊月到第二年的正月，为极旺期。因各地的学塾都要在新春开馆，必须准备大批书籍，各处书商，都争先恐后赶来聊城。当时交通工具落后，多用木船、骡车，山地用毛驴驮，张家口、绥远要骆驼运。主顾年终要货，要装许多大箱子，山西毛驴、张家口绥远的骆驼队，络绎不绝。除自板自印成书外，还从南方购来大批印好的书页子装订成书，盖上“书业德”图记，这种书叫做“南书”；在本地自己雕板、印刷成书的

叫做“府书”。以“南书”原页复刻板翻印的书也叫“南书”。“南书”多采用上等毛边纸印刷、纸质洁白柔韧，厚薄均匀。也间或用毛太纸印，但比数较少。“南书”都是大部头书。“府书”多为小部头，用毛太纸或“四则纸”印刷，后来还用粉连纸。凡唱本、歌本等小型板本，称为“小花页”。书业德所经营的木板书，不论“南书”、“府书”，质量都很好。其所发行的南书板本有：《五经备旨》、《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官板四书》、《史记》、《三国志》、《晋书》、《旧五代史》、《通鉴辑览》、《宋史》、《诸史考异》、《易经注疏》、《诗经精华》、《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注疏》、《说文解字》、《辨字通考》、《康熙字典》、《古文释义》、《历代名儒传》、《文心雕龙》等。经史之类，种

类繁多；医药方面的书，也有多种，有《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本草纲目》、《伤寒撮要》、《千金异方》、《针灸大成》、《信验方》、《历代名医集案》、《万病回春》、《痘疹幼儿全书》、《外科全鉴》、《眼科大全》、《医宗必读》、《景岳全书》、《丹溪全书》等，医学书中，大部头卷帙多而装订精致的，也多为“南书”中较为珍贵的页子，加工成套。其目录浩繁，不可胜述。此外，小部头的或单行本之类，如《医学从众录》、《达生篇》等，则是本店刻板印刷的。《外台秘要》、《徐灵胎医书十二种》等，则以原刻南刊本摹写雕本的。除此而外，还有卜筮、星相、风鉴、兽医、画谱、棋谱等类板本。还有小说。如《三国》、《水浒》、《列国》、《西游记》、《隋唐演义》、《彭公案》、《岳传》、《聊斋》、

《小五义》、《聊斋志异》等。这些所谓“闲书”，也不下二百余种。书业德共书板千余种，分库保管，设有“经、史板库”、“启蒙书板库”、“小说板库”、“医、杂板库”等。其所出版的启蒙书，其中《山西杂字》别地少有，这种《山西杂字》是四字一句的通俗韵语，内容大都是日常生活中应用的事物文字。如“学会写帐，再打算盘。”“麸子喂马，豆腐蘸蒜。”“升合斗斛，纸墨笔砚”等。小孩子念过、不用讲解就懂。此书颇畅销。

民国初，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委托书业德经销“教科书”，并派来一个姓陆的职员来聊协助，为时约年余，因在济南设“商务印书馆营业点而止”。1930年，土匪王金法焚毁书板大部，造成刻板资金困难，资东与经理协商改组，招收新股，曾改称“书业有限公司”，由陈竹亭任经理，原资东郭子安落拓无聊，遂于1931年回

山西原籍去了。还曾改名“书业堂”，不久又恢复了“书业德”原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聊城沦陷，书业德板库的书板残遭破坏，因板残缺无用，当烧柴卖了大部，选出部分完整的，已为数不多。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驻聊城，杂牌军赵振华、郭培德等将书板抢去当烧柴烧掉。解放后，书业德除卖货底外，改业经营文具。

聊城“四大书庄”除了书业德外，就数“善成堂”。当时有“双峰插云”之誉。它开业于乾隆初年（1736年），正当聊城历史繁荣的鼎盛时期。善成堂的资东姓傅，落籍四川，原为举人。大比之年，进京赶考，落第而归，路过聊城，见聊城书庄林立，书院满城。商业繁荣，文运大开，为他地所罕见。遂生恋意，于是立志在聊城经营书业。乃辇运大批资财，在聊城开办“善成堂书庄”。并在北京开设

“天成堂书店”，在济南、济宁、菏泽、张家口、包头等地设“善成堂分号”。规模相当可观，善成堂开设在城内楼东大街路南（书业德西约二百米）。临街三间门面，后院三进三出。房屋卅余间。门面东部两间设书架柜台，向后通往柜屋，西间为通后院的大门。有七、八个店员照应门市，另整批发。后院分别设客厅、接待室、宿舍、作坊、书库、纸库、板库等。二十多名师傅，五十余名职工。经理例由职员递升，先后有束鹿郭家、枣强何家、聊城孙家等充任。郭、何任经理期间是其兴盛时。除自板自印外，还从南方运进大批印就书页来聊城加工成“南书”清代科举盛行时，每遇“大比”，则抢先刻板印行所谓“闈圣”，即状元，进士们的撰文选集。有《顺天闈墨》、《直隶闈墨》、《山东闈墨》等。善成堂的“闈墨”、《山东闈墨》由济南分号搜集材

料，送聊城刊印，《顺天闾墨》、《直隶闾墨》则由北京天成堂印好现成页子，由运河运来聊城，加工成书后遂与《山东闾墨》运往济宁、北京批销。这种赶时间的生意，其他各书坊都没有这种有利条件。人们说：“沿河九大都市，善成堂控制了三个。京城、省会都有善成堂的人。”所以善成堂经销“闾墨”数量特大，为其他书庄所不及。善成堂终年忙碌，平时给分号发货，张家口、包头骆驼队每月一次，济南、菏泽大车队十天一回，北京、济宁或三天或五天，即来取货，更有江南大船来纸入库，夏末各分号负责人来聊城议事，自旧历十月南方大批进纸，直到来春院里纸垛才消失。秋近外地客商此来彼往，腊月，特别是“乱市”，外商为争取早日回家过年，形成抢购。此时，客厅也改为营业室，设柜台、陈列大垛书籍，应付外地书商。并临时赁房数处，又双资招雇大批临

时工，赶印急用书籍，以应付销售。一进腊月，资东对职工就实行“双工资”，半夜后到天明，则“双加双资”，另外“酒席款待”，可见当时书业繁盛之谓。善成堂书板很多。“四书”、“五经”、“小说”、“医书”、“启蒙读物”等自刻书板四百四十余种，后又增添“别集”、“木效”、“卜书”、“善书”、“画谱”、“棋谱”等二百余种，另“闲书”板百余种。其盛期存板近千种。其板本大部头精装的有：《官板四书》、《四书亭训》、《二论典故》、《五经体注》、《十三经注疏》、《诗经精华》、《尚书注疏》、《书经大全》、《易经体注》、《周易注疏》、《周礼精华》、《春秋左传》、《左传句解》、《左传注疏》、《春秋谷梁传》、《史记》、《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

史》、《新五代史》、《宋史》、《西汉记》、《竹书纪年集证》、《二十四史约编》、《诗史致异》、《六书分类》、《东莱博义》、《明儒学案》、《说文解字》、《新字通政》、《辞通》、《古文观止》等。小说有《三国志演义》、《精忠岳传》、《东周列国志演义》、《绣像封神演义》、《水浒传》、《绣像水浒传》、《西游记》、《绘图西游记》、《隋唐演义》、《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济公传》、《包公案》、《彭公案》、《西厢记》、《红楼梦》、《聊斋志异》、《镜花缘》等。还有医书、卜筮、星相、画谱、棋谱、启蒙教物、“小花页”（即小型唱本）等，种类繁多。还有聊城旧时流行的所谓“善书”，名曰“宣讲”。善成堂板本有《宣讲宝铭》、《宣讲全鉴》。《宣讲宝铭》为王新铭编著。王新铭，字子盘，聊城市后菜市街人，

教私塾为业，业余编写此书，内容取自民间故事，并改编小说中的故事，如《聊斋志异》中的《仇大娘》、《张诚》、《大男》、《菱角》、《胭脂》等篇。每句十字成韵，同治年间成书。《宣讲全鉴》为博平县（1956年撤销归茌平县）一“老儒”所编。姓氏不详。这些书的读者多为老人。夏天在树荫下唱给闲人听。书中有唱有白，十字一句成韵，其腔调与“吕剧”腔调颇相似。民国间，以万寿观皋台上大槐树荫下为最常见。俗称“讲善书”的。

善成堂的书板，均聘请堂邑雕刻能手刻制，有自制原板，也有的翻板、复制板。原板先请人写样，“写样先生”据要求设计板和字的大小、小规格、式样，然后照稿在质韧而薄的纸上认真书写。成样后再交雕刻工刻板，雕刻工先将成样反贴于木板上，叫做“上板”，上板后逐字雕刻。“翻板”是以印好的书样作为

底板，逐页贴在木板依样雕刻。复制板是以印好的善本书逐页摹写，以此为底样贴在木板依样雕刻。善成堂不论原板、翻板和复制板，均甚精美，无不线条挺劲。刀法圆熟、技艺高超。刻成后先将板放在花椒水里煮透以防虫蚀。刻板工程浩繁。如《四书备旨》板高七寸四，阔九寸，用六五毛边纸下七个头，全书四百六十六页。需刻四百六十六块板（也有反正面刻的，省板一半）。《三国演义》多达一千一百余页，工人分头雕刻，需三年功夫；一部《五经备旨》刻工工资需一千五百两银子。可见须资本雄厚才能办到。善成堂最讲装璜美观。甚至启蒙读物，莫不精美。民国年间，一般书庄（包括书业德）所发行的《千家诗》的书皮都是用单层粉连纸，装订则用一节铁丝。而善成堂一律用双层兰色厚纸为书皮。用白丝线六孔装订，并有内书皮。外书皮左上贴以黄签，下衬白签，黄书签上印

有“校正无讹五七言千家诗”下注“东昌善成堂藏板”字样。形成了兰皮，白线装，白边黄书签的美观象形。外皮内又有副页，副页内才是内书衣。善成堂的书签和内衣的题字都请名手、老秀才“圣手书生”刘凤藻或书法家肖蒲田写样刻印。较好的书，则用绢做书皮。虎皮宣纸衬以白菱为书签。多本书成套的则用“书函”装置。书函分三种：一为书套，俗“四合子套”，是用硬纸板外贴兰布（珍贵书用兰绫子）做成。二为书夹板，木制。三为书匣，珍贵的书用木匣，一般用硬纸板外裱以布或绫、绢做成。书套或纸板为书匣，上面均贴以黄底白边书签，侧装以骨签（错骨王出品）紧扣布环；书夹板或木书匣则雕其书名于板面、箱面、涂以彩色，颇为美观。故深受读者赞许，销路颇广。光绪年间“戊戌政变”，废科举兴洋学，聊城运河淤塞，善成堂往年最得力的“闹

墨”彻底垮台，南方纸运输不便，北京天成堂逐渐来往，其他各分号也逐渐独立，善成堂生意因而日趋萧条。印刷术的改进、石印、铅印逐渐代替了木板印刷，进入民国，聊城设有“中华”、“振东”、“掇西”三大书局，发行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的铅印教科书。代替了木板书，其他木板书坊相继改业，而善成堂却仍坚持干“木板书坊”。1930年聊城遭王金法土匪二次陷城，书板、书籍遭受摧残，1938年日本陷聊城后，汉奸又进行敲诈勒索，善成堂书板、书籍再次受侵害。1943年大灾荒。善成堂开始“卖货底”、卖家具，连柜台、架子也卖了，末期少经理孙德兴因屡遭天灾人祸，气怒得病，年仅廿岁即逝。1945年善成堂卖光吃净，终于停业。

“四大书庄”的第三名即宝兴堂。开业于康熙中叶，资东先是李家，后是林家，都是河北

衡水人。聘请聊城李家任经理。宝兴堂座落在聊城城内古楼大街安乐巷路西。高阶大门，金字牌匾，大门上贴有“宝非珠玉；兴待圣贤”的春联。院内营业，并无临大街门面。其院落是传统式的“四合子房”，另配以北跨院做为作坊、书、纸库。大门南边有三间东屋是营业室。其南间设柜台、货架，中间为客厅，北间为暗间作柜房、东屋向西是二门，内院西屋上房住经理、南北屋住师傅、店员。北跨院作坊有三十多名工人，五、六名师傅分管印刷、装订等工序。另外还有临时工。营业室店员每日忙于取书、送书、包装、还招待顾客。外客商有北京、天津、包头、绥远、衡水、太原、济南、徐州、兖州等地的，大商客一次买几大车。外客商来了，选货列单，按单取货，一一装箱，核对无误，即行装车。其板本除了启蒙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

文》等外，即“四书”、“五经”、“经”、“史”、“子”、“集”，还有医书、棋谱、画谱等。主要是小说。如《三国》、《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三侠五义》、《西厢记》、《红楼梦》等。宝兴堂的《红楼梦》很出名，曾列于《全国书目》中。宝兴堂还印行大量“小花页”，如《包公铡陈世美》、《孙悟空大闹天空》、《双锁柜》、《水漫金山寺》、《杨贵妃醉酒》、《陈三两爬堂》等。科举兴时，还搜集考中进士的文章，印一些《直隶、山东闹墨》。

“戊戌维新”后，废除了“八股文”，变通了考试办法与内容。宝兴堂又刻印了《经济特科要旨》、《策论粹新》等书，适应了形势，迎合了求功名的士子研究策论的心愿，各地书商、纷纷来宝兴堂抢购。民国后，宝兴堂又销售石印的启蒙读物，如“三百千千

万”（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万事不求人》），还发行《珠算大全》、《尺读大全》等书，迎合时代精神，社会需要。所以宝兴堂比善成堂维持的时间长。宝兴堂的书板来源：一是自刻（均请堂邑刻工）；二是购改（由倒闭书坊买旧书板，将原字号挖掉，改为“宝兴堂”字号）；三是翻板（以旧书为样本底板，套刻）。宝兴堂自制板多请“圣手书生”刘凤藻写样，刘凤藻系堂邑定远寨（1956年划归冠县）人。是个老秀才，善于工书，其字肤廓明朗，善书宋体字和正楷，字体融柳欧，间架波磔，疏密适中，颇美观。宝兴堂的《神农本草经》、《昭明文选》等板，写样均为刘凤藻之作。宝兴堂除以自有板印行外，并由南方购现成书页来聊加工“南书”，书面印有“宝兴堂监印”字样。也有以南书原页为底板翻印而成的南书，纸质相当

好。好书用好纸，启蒙读物、小花页则用次纸。民国后宝兴堂逐渐衰弱。天灾人祸，书板散失，中华、振东、摄西三大书店推销商务印书馆课本，代替了木板旧书。宝兴堂销量日减，收益日少，乃经营乌枣。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汉奸赵振华、王金祥盘据聊城，以书板当柴烧。宝兴堂书板全部毁坏。到解放时，宝兴堂已停业了。

第四名即有益堂书庄，是因“开卷有益”的成语而命名。原开设于直隶（河北）衡水西关，康熙末年，即与聊城宝兴堂书庄因同乡关系有来往。从南方购纸先用船由运河运到聊城，寄存在宝兴堂，然后再雇大车运往衡水，还通过宝兴堂联系堂邑的刻板工。后来见聊城比衡水经营方便，销路广，于是在聊城东门里赁房设了分号。雍正年间，在聊城楼东大街路北（今地区供销社东部）置房。将分号改为总

号，而将衡水总号改为分号。聊城总号投资一万吊钱。经理张绍基，后转邹家，又转周家。资金雄厚，生意兴隆，遂为聊城“四大书坊”之一。有益堂有座北朝南的门面三间，后院宽广，有作坊、书库、纸库、板库、客厅、寝室等。前面门面东部为货架柜台，通柜屋，西部为进、出货，拆装包、验货之所。中间是通向后院的正门。门悬清代聊城著名书法家朱学笃所题“有益堂”匾额。门市有店员七、八人招揽顾客，作坊有三十余名工人，七、八个师傅，另有不少临时工，循序进行印刷、装订等工作。门市店员，终日忙于照应前柜，接待顾客。除另售外，并有大量外客。客人除鲁西附近县镇者外，还有东北、内蒙、山西、河北等地的远客。外商一买几车，在几个书坊选购配套。有益堂与宝兴堂关系密切，互相交流书板。有益堂板本和宝兴堂板本颇相似。如四

书、五经、经史子集、杂家、医书、小说、还有《古唐诗合解》、《五方元音》等。至于启蒙书如“三、百、千、千”等更不必说，书板计五百余种，数十万块，其板除自刻外，还收买一些倒闭书坊旧板，将其原字号挖除，改补为“有益堂”字样。也从南方来原页加工成“南书”和复制南书板自印南书。其所用粗糙纸印的启蒙读物叫“草板书”，所印歌本唱本，称为“小花页”。有益堂自制书板多是请上等写样先生，选精勘善本为底本，交写样先生照样摹写，字体、点、画、行、披，均依原书，只改字号为“有益堂”。这些写样先生并非一般工人，比师傅还高一等，是“上客”。每写一块板，得成吊钱酬劳，能买好几斗米。还要酒席招待，可见制板费用相当昂贵。有益堂刻有一种理发业技术书，名叫《净发须知》的书板，此板别的书庄没有。此书不仅介绍了理发

技术，并详述了“推、拿、点穴”、“拿闷”、施术之“绝窍”。施术时能使人暂失知觉，如服麻醉剂，苏醒后浑身舒服，精神爽快，烦恼净除，对一般神经性头疼等病均见良效。推拿按摩可舒活筋骨，筋骨错位可恢复正常，此书现已绝板失传。还有《冷发烫知》，书中绘有图解，注释详尽，此书亦绝板。有益堂除有《四书备旨》大路货外，更刻印《四书图考》，《四书典故》，每页眉端增印《字典》的称为《字典四书》，以投合读者心理。“戊戌政变”后，有益堂又印《历史》、《地理》、《自然》、《经济》、《政治》等书，迎合形势，吸引读者，故生意兴隆。特别每年古历腊月，各地准备新春开馆，张家口的骆驼队，河北的大车邦，山西的毛驴群，纷纷来聊购书，连同聊城毛笔、年画、一起大量批购，形成“乱市”，因外客慌着回家过春节，都抢

先购买，甚至“买到手第一，价钱第二”，这时，不但大书坊，而且小书坊、甚至书摊，也抢购一空，聊城的书、笔、年画行业，无不日夜忙碌，掌柜的为多销货，多生产，对工人实行双工资、“双加双”、“夜宴”，有的工人为了多得几个钱过年关，闹跨了身体。掌柜的登门看望，为的使工人恢复健康后继续多干活。到了民国，木板书为铅、石印书所代替，有益堂每年还可销七、八千木板书，但远不如昔日兴盛之状。有益堂见木板书已临末路，又开始经营新书和文具，日寇占聊期间木板散失，又以经营文具为主，1946年因汉奸政府横征暴敛。有益堂倒闭。解放后，其店员马运生与万元长笔庄合营为“义记”文具店。所藏木板书在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又被当做“四旧”毁掉。

除“四大书庄”之外，较大的还有敬文堂

和文英堂两家，与“四大书庄”合称“六大书庄”。此外还有王家“三聚”，即聚锦堂、聚和堂、聚盛堂。其余的都是些中、小书坊了。如崇文堂、文奎堂、万育堂、品文、魁元、三和、万兴成、三合、三友、文焕、文筠等。这些书庄，均集中在聊城城內古楼东大街以及东门口内外。清代聊城的行业集中，古楼至东门一带多为书、笔两行；东关西部及旧米市街多为杂货行；东关东部、清孝街多为纸作坊、年画行；闸口以东越河圈则多是鞭炮行和竹货行了。前菜市多为乾鲜果品行，元宝心则是粮行中心；太平街、双街多是外地人所经营的货栈；沿运河两岸则是客栈、旅店，搬运栈集中地。

“四大书庄”现已不存在，但他们出的书一直流行至1966年，因遭“十年动乱”大部被当做“四旧”毁掉，至今保留下来的为数不

多，已成为聊城珍贵的文史资料。在聊城文化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聊城中华书局简介

金永昌

聊城为鲁西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明清两朝，名宦辈出，举其著者，即有任、邓、朱、傅、耿、许、逯、邵、罗、唐十大家。俗称“东潍（潍县）西聊（聊城）”，实非过誉。由于文风之盛，书业大兴，因而出现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四大旧书庄。辛亥革命后，又有中华书局、振东书局、摄西书局三大新书店先后创建。现就见闻所及，简述中华书局情况如下：

聊城中华书局创办人为王露亭先生，该局在辛亥革命时期原名文华书局，王露亭不仅去北京、天津购进中小学教科书，还向济南教育

图书社购买上海各书局的书刊在聊城销售。王露亭在回忆文华书局改为中华书局之经过时，是这样说的：“文华书局开业之后，生意兴隆，书刊多由天津、北京两地运来，年余之后，计划再进一步扩大经营项目，发展业务，我想去上海把关于文化事业的书刊、仪器办一些来，并顺便参观一下文物荟萃的大上海，多购一些迎合时代的新读物。

“我到济南后，在教育图书社认识了潘蔼仁先生，他是上海中华书局驻济特派员，同时我又和上海商务印书馆济南分店经理沃子敬等见了面，由于彼此常做交易，感情很为契合。

“从济南赴沪前夕，潘蔼仁先生把写好的一封信托我带到上海交给总经理，到沪后，我把这封信送到福州路中华书局，却不知他这封信是介绍我的，说我在鲁西北经营书业，筹划

有方，信誉可靠，请总柜方面与我作进一步的接洽，以资推广业务等语。当时由其经理陆费逵，副经理申之芝等殷挚招待。

“双方洽谈之后，很顺利地达成协议，由我以上海中华书局东昌分局的名义，包销山东东临道二十九县的本版图书，及各种文教仪器。根据书局章程，须缴纳三千元保证金，但我没有那么多现款，又以通融办法，先缴数百元，以后陆续汇寄。

“这次我由沪满载而归。由中华书局发运图书货品三十多箱，又从济南悦来栈转运聊城，从此树立了更加巩固的营业基础，努力扩大销路，经常不断地以新型科学仪器和新文化出版物供应鲁西北各州、县、镇的文教界及社会广大群众。1914年把文华书局字号撤销，正式挂上中华书局的招牌，1921年自建楼房告竣，迁入营业。”

中华书局原先开设于聊城楼东大街路南一座住宅之内，并无铺面，在大门之内有南房三间，内设柜台书架，顾客只能在柜台前买书，不能到书架自取，只有熟客才可以入内参观。当时只有营业员三四个人，轮流服务。多数顾客感觉不便。1921年在楼东大街东口路北建造二层新式楼房七间，中为大门，一楼东西各有门面三间，东边为茶叶店，西边为绸缎店，均租于外姓经营使用。

大门上方刻有中华书局招牌，大门之内有北房五间为营业室，正中高悬大总统徐世昌所书“富擬嫫媢”大匾一方，是当年书业中所仅有的。营业室外还有东西厢房各三间，存放货物，前门二楼上专为招待客人之用。这是由于生意兴隆，外地客商来往众多，均在店内食宿之故。北房营业室后，还有一进院子，为店内人员住所、厨房和存放杂物之处。

中华书局迁入新楼后，经理仍为王露亭，店员五十余人，经常在营业室服务的有胡国桢等十余人，他们态度和蔼，颇受顾客赞许。书局除王露亭投资以外，还有堂邑蒋姓投资入股，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约在两万元以上。

中华书局经营的图书是以上海中华书局的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著名的工具书《辞海》，在当地也销售颇多。除经销京沪各书局新旧小说及其他文艺书刊外，还出售许多英文书籍，如《纳氏英文法》、《英文字典》、《天方夜谭》、《双城记》、《黑奴吁天录》等原版著作，深受聊城一带学习英文者欢迎。

1919年“五四”运动后至三十年代，聊城出现新书甚多，如《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和鲁迅、郭沫若、蒋光赤、丁玲等人的著作均供不应求。有些畅销书籍，如张恨水的《啼

笑姻缘》、《金粉世家》、《京沪二十四小时》，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等著作，此外还有《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等小说，上述各书，聊城中华书局也有出售。

中华书局除经营书刊外，还陈列销售一些体育、音乐用品及各种教学仪器等。推动了鲁西北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

1937年冬，范筑先将军在聊城曾为小学教育所用的教科书召开座谈会，邀请中华书局、振东书局、摄西书局等方代表参加，中华书局后来出了些抗日小学教材的油印本、铅印本。铅印本教材为语文、常识、数学、地理、历史等，不过还是沿用旧教科书印制的。

1938年8月间，由于日寇逼近聊城，王露亭迁居济南，中华书局即行停业。该局大楼在1962年因开扩街道拆除。

回忆欠全，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至希指正！

一九八六年九月四日

解放前聊城的金银首饰业

刘延忠述 周莲霞记

(一)

聊城生产金银首饰的历史悠久，元、明、清三个朝代的庙碑上，有不少以制做金银首饰为专业的“银楼”字号捐款的记载。从捐款银两数字上，可见当时这一行业相当兴隆。民国后至抗日战争前，聊城城关还有大大小小十多家。如：

泰宝银楼	楼东大街	经理张殿学
兴盛银楼	东关大街	经理张风桐
宗盛银楼	菜市街	经理张东山
汇宝银楼	东关	经理赵长明

东盛银楼	小东关街	经理苏之诚
泰成银楼	越河圈街	经理李绍春
鸿祥银楼	城 内	
源祥银楼	楼东大街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地方动荡不安，而这一行业的经营，并未断绝，直到解放前夕才消沉衰落。

(二)

首饰是总称，依需用对象不同而产生许多品种。以制做成料性质，可分为“丝活”、“响活”和“片活”三大类型。各类的成品名称是：

丝活，以银丝或金丝蟠结、连系、编织的品物，如九连索，龙齐耳坠，团蛾，九连环戒指和四连环戒指……等等。

响活，附系小铃，摇动时有清脆响音。有

小儿腕铃（有多种样式、如小瓢、小印、石榴、花兰、莲蓬等，一个个用绒绳串起，系于手腕），飘带铃和裙铃……等。

片活，锤金银成片，加工为成品。如长命富贵四个字，多为娃娃帽上的装饰品，也有老寿星、弥陀佛、八仙人……等等。

首饰品类中，这几种“活”的制作技巧相互联系。即丝活中也夹片活，响活中也需丝活点缀。如钗、簪、钿、花囊、戒指、手镯、项饰等等。每一种都有不同花样，单靠一种料品是难以达到要求的。如镯子，有缠丝镂花的，有点金点翠凿花的，皆小巧玲珑，争奇斗妍。戒指有镶嵌宝石的，镌刻双喜字的等等。

这些不同品种的首饰，制造程序复杂细致，煞费工夫。艺人们凭其传统技术，运用熟练的双手，做出图案美丽，精湛巧妙，结构紧密，形象生动，千姿百态的成品。如整花镂镌

的纤小零件，花纹清晰有立体感。又如龙凤银镯，系以银丝镶嵌再加工精雕细刻两相结合制为成品的，神态逼真，栩栩如生，充分体现出鲜明的民族色彩和艺人的高度造诣。

（三）

制做首饰的工具多种多样，都是小型器物。如，平捶、手捶、响铜制做的光捶、手钳、火钳、坩埚、炉子、风匣、化银槽、大小钻子、平锉、尖锉、光锉、镊子、剪子、模子、鑿包子（内有花鑿、钝鑿、快鑿、冲子等），拔丝床子、拔丝虎钳、拔丝板、地桌、坑桌、玉泉沙、砂子盆、料珠之类。这些工具，看来很琐碎，但都是不可少的。因为融化银子和打首饰，每道工序，全是手工操作。金银首饰轻巧纤小，有了这些小工具，一个人就可干活。

打首饰，首道工序是融化银子。融化银子要用一种“坩埚”，这是专门溶解金属晶的用具。银楼用的坩埚不大，一次可溶化五两银子。熬时用煤火，拉风匣，也可以烧柞木炭。把银子溶解后倒入“银槽”（银槽为铜质或铁质），凝固后，根据用途分别做出不同形状模型，此为初步原坯。如拔成细丝、捋为长条，播成薄片等等。第二道工序是用小锤子一件件的慢慢敲打，成为适合应用的材料。播打片子要铺在锡质的垫子上。因锡质柔软，不致损伤银片的原型。每枚成品的图案，用鏊子轻轻鏊出花纹。剪裁、镂、雕、经过种种细工才宛然成形。应缀垂须的，系铃的，镶宝石的，再分别施以技巧，使其联系为整体，成为一个成品。这是属于“片子活”方面，在工艺之中，还不算怎样细致，可以归入大路货之类。

按银楼业的工艺性质，习惯地分为“坑上

活”，“地下活”。片子活属于地下活，即多用镶嵌功夫及篆刻技术。至于更精致费工的是属于炕桌上的“花丝活”。该活工艺繁杂，要求严格，须用各种不同的金银细丝，以堆、垒、编、织等技法制成首饰，操作过程复杂而精巧，难度较高。技艺工人要掌握花丝活。必须有坚定的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狠下苦功。

“点翠”工艺，也是银楼业中的超级技术。翠是翠鸟的羽毛。色泽蓝中透绿。把它贴在金银上，可产生金碧映辉的效果。聊城“城隍庙”正殿里装塑的城隍夫人，全身服饰都是真的。她头上戴的凤冠，堆珠垒翠，华贵庄严。就是用点翠与花丝工艺结合制成，珠宝镶嵌，婀娜多姿，技巧之精，令人赞叹。

无论镶嵌和花丝，都离不开接缀联系的焊工。这工序也较简单，用小筒子凑近灯火，用嘴吹，把灯头烈焰集中吹向要接焊的地方就成功

了。如果镀金首饰，另有一套镀金工具。由化学镀剂浸液而成。银楼制造的金银首饰，大大小小花色品种，足有三、四百种以上。这些成品，由于全是手工操作，雕凿镌刻，镂月裁云，细致纤巧，风格不同，惹人喜爱。

(四)

聊城的银楼行业，有几家老字号，如“泰宝”、“鸿祥”等，资金雄厚，产品种类繁多。除门市零售外，并派员分赴外地，携带货品，批发给外县乡、镇同行。每年营业额庞大，用的职员也多。但中、小家银楼还是占多数，他们虽有门面，但规模较小。有的一、二个人干活，连家店自东自掌。更有甚者，连一间门头也没有，仅靠赶集做生意。至于有门头的小型店铺，也是一样赶集。农村中也有干银

楼的，春冬农闲时做活，全靠赶集，作为一种副业。

聊城四乡差不多每天都有集市。较大的集市如蒋官屯、李海务、沙镇、柳园、阎寺、许家营等。农村中婚娶、嫁女、小儿弥月，都要买首饰作嫁妆或交换礼品，大多是赶集来买，因而交易繁忙。一般经常赶集售货（首饰）者，都有个门市部（指声誉、信用而言），须叫人信得住，赊欠欠也可以。

银楼赶集卖首饰，有固定地段。同业家接连在一条市，各支一张小桌，上面摆上铁丝编的方形笼子。笼子四面有枣样大小的孔洞，一个个密排、均匀。从外面可以看到里边垂挂的货品：钗、镯、耳坠、项圈、簪子、戒指、五光十色、璀璨满目。笼子是活页的，可以折叠，临时安装，十分简便。用它陈列货品，是银楼业的特有标志。

首饰价格，不以件论值，而是按其分量而定。要一支簪子、一副镯子或坠子，甚至小至一枚帽花，都拿戥子称称。几钱几分，再照定价核算。但也有视首饰费工大小，价格有所差别的。

首饰用途广泛。按其社会需要，可分翁姬、闺女、少妇、婴儿等数类，並以年龄、身份、婚嫁、丧殓等具体情况用什么，不用什么，都有传统的风俗习惯，不容混淆。再有戏剧演员所需的“头面”、珠玉冠服，又另是一套品种，其造型优美，色彩绚丽，可谓独树一帜。其用料和耗工艰巨，不同于一般普通用品，所以价格也高。这一类属于大型银楼产品，中小商铺是难以承接的。聊城银楼业，城市与农村不同。城市制造、供应的品种多模仿都市，趋向时髦。农村制造的产品，保持朴素风格，不标新炫异。这种情况，各地皆然。

各个行业，都有他们所尊崇的祖师爷。银楼业供奉“欧歧佛”为祖师。这位佛是谁，本行业中人也谈不清楚。查《辞源》引《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越绝书》有这样记载，“欧冶子、春秋时人、善铸剑。越王聘之作五剑，曰湛声、巨阙、胜邪、鱼肠、纯钩。后又与干将为楚王作三剑，曰龙渊、太阿、工布……”。这位善铸剑的欧冶子，是否欧歧佛，尚待考证。

解放前聊城的中药铺

朋南、庆顺

一

老东昌府，工商业发达，开设的各类商店字号很多。有的经营数百余年，罔替不衰。流传久远。如东关的“复兴醋店”创自明代。山陕字号的怀德、益寿是清代中叶的中药铺，其经营方式，行规铺规，稳扎稳打的严肃作风，尤为老东昌府买卖人中之典型。

中药叫“国药”或叫“草药”、“汤药”。有了西药后，才叫“中药”。干这一行，必须是门里出身。经营作风实实在在，别胡弄、别狠利，创出个门市来，才能得到社会信任，保证年年顺利，即使发不了大财，也一定会有盈

余，不遭意外事，绝不会亏赔。

明、清时，中药铺在聊城相当兴隆。那时候运河水终年长流，南北交通频繁。济南还没有开辟商埠，各路客商皆奔东昌府。药材为社会必需物品，大量地集散，形成了鼎盛气象。从山陕、江西、苏州几座会馆中的碑石上，可以证明那时期药铺规模之大，捐款之巨，营业之繁荣。

民国之后，中药铺生意虽然大不如前，但不过是经营范围缩小，大多数还可支持。有的大型字号，因系合伙营业，间有改组或拆股的，到了民国十八、十九两年，地方上迭遭匪乱，各行各业受到摧残抢掠，元气大伤。大小店铺，有的勉强维持，有的改行另谋出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聊城沦陷于日寇，药铺和其他商业一样，损失惨重，先后倒闭。以后，小型药铺为了维持生活，勉强复业，由于日伪苛税压

榨，谁也不敢放手扩充业务，有名的药铺更是缩小门面或变更字号，以免树大招风，引来祸患。直到解放，“公私合营”之后，才走上新生之路。

聊城在过去有多少家药铺呢？据百岁老人常四爷谈：“大清光绪以前，东昌府正火爆的时候，城关的药铺大大小小的有三十多家，多半是山陕两省的买卖，本地干的也有几家象样的字号。那时，赫赫有名的有十八家，称为“十八大堂”。每家都有百多人员，並在临清、大名、济南、济宁等地设有分店，生意茂盛，财源亨通，可称为中药业的黄金时代。

民国以后，大的药铺部分停歇，中小型药铺开业与关闭此起彼落。今将民国初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一二——一九三六年）聊城城关的中药铺，开列于下：

太和堂 太元堂 福寿堂 三生堂

文和堂	怀德堂	益寿堂	济春堂
西益寿堂	保和堂	仁和堂	同德堂
同育堂	宏德堂	怀仁堂	怀生堂
庆合堂	文和堂	永生堂	吉升恒

至于个人也当医师也开药铺，连个招牌也不挂的，就难以计算了。

二

中药铺专卖中药材和用中药材制造的膏、丹、丸、散。

聊城的中药铺其门脸布置和柜台陈设，大致都是一样，铺门外，大的字号竖有一块高达六、七米的“通天招牌”。一行大字上写：

“××堂发卖川广云贵生熟地道药材”，房檐下装有一列四件外伸尺许的横木，刻有龙首，口含铜勾，分挂四块长型招牌，写，“××堂膏丹丸散”、“××堂遵古炮制”、“××堂

咀片药酒”、“××堂参茸燕桂”，当中金字大匾为名人书写的字号名称“××堂”。老式门脸全是三大间，卸去板搭统统敞开，豁亮通达，一览无遗。大街行走的人群可以从很远就看见。人们走到药铺跟前，只见铺外金字牌匾，辉煌耀目，铺里柜台货架，整齐可观，药臼捣药声叮当不绝，柜内柜外，取药抓药，忙个不休。

药铺的店堂布局是这样：一溜柜台从左到右，右首是过道，通往后院，另开一个隔扇门，犹如屏风。柜台里面正中央置一张长方型柜橱，上面安装小型列屏。横嵌玻璃、硃书本店字号或书“京药局”三大字，这上面摆上了大小匀称的瓶瓶罐罐，贴有墨书标签，多为珍贵药品。柜橱后就是药橱，两橱并列。一橱上下左右都是七层格子，每个格子中一只药斗，就是我们常说的抽屉。每一抽屉横隔为二或横隔为三，内装各种加工炮制好的中药。每个抽屉

中的药，按性质相类，分隔搁放，以便抓取。如属于安神镇定药的枣仁、远志、茯神，就可以隔装一抽屉。属于滋补药的茯苓、白术、黄芪、党参之类，就可以使其靠近，泻火性质的生地、元参、桔梗，活血性质的当归、川芎、白芍等，都是这样以类相聚靠拢一块，药橱最下层的是专装一种药物，如竹叶、灯芯、竹茹、蒲公英等，因为这类药蓬松扩散（扎哄）小抽屉放不下它。大药橱顶端一层，大多摆列着一溜磁缸，内装不能走气回潮较为贵重的中药。药橱再上一层，安扎连接着一道绷子，形如横匾，高接天花板，上面统用宣纸裱糊，贴上斗方形式的名人笔迹，有书法、山水、花鸟等，点缀得典雅壮观。店堂中间在前柜之后，上面如雁行横排，悬挂着一叠叠木板刻印的各种膏丹丸散的说明书，不下一二百种。每一种都外有封面，如书本形，贴有条签，写着这本书的

名称，如“六味地黄丸”、“天王补心丹”等等。

柜台另一边，靠墙安了张桌，专为收款，记帐而设。左右两边山墙，挂有条幅对联，讲究名家手笔。从帐桌后可掀门帘进局屋去，局屋里也是陈设整齐，有桌椅方凳，茶几卧榻，供招待客人休息之用。通往后院的过道山墙下，也设有茶几和靠背椅，供买客抓药等候时歇息。又横揽一座柜台，和前面柜台衔接，成楞角曲尺形。柜台靠药橱那边，立一坐牌，上写四个大字，如“心存济世”、“岐黄事业”或“同登寿域”等。从这坐牌后走向柜台里面去，仅可容一人通过。

这种店堂布置格局称为“一条龙”。聊城城关大型药铺多是这样。小药铺如是两间门脸，就只用两座柜台作曲尺形摆列，占去一间。另一间设桌椅条凳，供客人坐息。墙上少

不了也挂有字画点缀，但局势不够阔绰了，少数的也有和其他店铺一样，作两边安柜台中间是过道的，称为“二龙抢宝”式。但不很多。

三

药铺里的人，上至掌柜，下至学徒，都是科班出身。对于中药知识，没有不在行的。凡是上药铺里去学徒，进铺后白天干活，晚上必读药书，识药性，然后才可上柜台抓药。抓药的时间一长，接触的病人和处方多了，也就会从中悟出些医理，记得些单方，天长日久，便能对一些普通病症辨证处方。如果再用心些，就可以熏成个“先生”了。这种由“拉药抽屉”而成为医生的，聊城也有好几个。如刘承庆、赵玉真等医生，以前都干过药铺学徒。站柜台，对顾客的诉病买药还得起个“咨询服务”作用，对一些小毛病，应用什么药，可以

替顾客解决。

药铺还有个规矩，就是昼夜营业。药铺无论大小，晚上闭门之后，倘有病家抓药，一喊就得开门接待，纵是数九寒天的深夜也不例外。为了夜间抓药方便，都在门板上留了一个方形洞口，有小门有插关，可以启闭，以便递药单付钱取药。这个规矩，确也方便了那些患急重病的病家。

现在我们抓中药，往往碰到抓不齐的情况，不是缺这味就是缺那味，而旧时代聊城的中药铺是绝对没有这种事情的，哪怕背街僻巷，只有一个人经营的小药铺，也从没有叫病家跑好几家去配单子的。虽然从前的药铺多是把常用药准备齐全，缺货是很少见的，但是每家的药，都准备的很齐全吗？显然不可能。因为一张药单抓得齐抓不齐，直接影响到药铺的名誉和营业。为保持本店的名誉和经济利益，所

以遇到缺药时，就马上暗中派人到就近的药铺通融，或买或借，总以配齐为原则。一般说来，药铺同行之间，都互相帮衬的。

一张药单子，无论多少味药，药铺柜台上人员接过后，放在柜上，用镇纸压上，由两个人各持戥子，按单中药方，一味一味地抓秤，抓秤好一味，就倒在一张白纸上，待全单抓齐了，两个人一面检看纸上的药，一面念单子上药名，一样样核对无误，然后各药各包。包好拿毛笔号上此包药名。从前，每包药上还附带一小张说明书，（聊城吉升恒药铺有这规定），上绘此药形状和性能、主治病症。如果药单中有易凝、淀、分散、融糊的药，须用纱布另包后下锅。抓药时把包包好后，就必须另笔标明“布包”二字。单中有较贵重的药，或晶体轻浮、粉细的药，包纸里层要衬上乌金纸，防其飞散，透潮。药单中常有车前子、旋覆

花、海金砂、生蒲黄等，也都应用纱布包一层。

药包好后，一包一包垒叠一起，另拿一张大点的纸，统统包妥，用细经子扎牢，递给顾客。至于核算这张药单价目，拿算盘按每味药定价逐一递加，算出总额后，就用暗码划在药单背面。因为药铺里药的价格不是绝对的标准一致，在丝厘毫忽之间，也允许差异。所以划个暗码，预备下次这张单子再抓时有底，以免别的同事核算有误。这个暗码，外人是看不懂的。而且一个药铺有一个药铺的暗码，同行之间也互不认识是划的什么。大抵都用十个字，代表一至十的数目，而十个字中，也只用其中某一字的第一画，再加上另一字的第一画。就暗示数目了。聊城仁和堂药铺是用“招财童子至，利市天官来”十字。太和堂是用“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十字，虽然各家暗码不同，价格大体仍是八九不离十。一张药单到谁

家抓，也就是一分二分之微差而已。

四

当时聊城有几家规模稍大的药铺。如城里的西益寿堂、太和堂、福寿堂、怀生堂，东关的怀德堂，吉升恒、同德堂等，各自都有炮制加工中药的作坊。作坊大都在店堂后面。分刀坊和火坊。刀坊是对药材进行切、剪、铡、锤、碾等的加工；火坊是办理煨（猛火烧）、炮（急炒）、炙（烤）、蒸、煮、熬等方面的加工。药铺的招牌有“遵古炮制”字样，就是说所有应加工的药材，都要严格地遵循传统古法，施以不同的炮制，绝不能偷工减料，自欺欺人。因为别的商品以假混真，仅止骗钱而已，而药品能危害人命、影响太大，不能不认真。

药铺，还自制膏、丹、丸、散等成药。这些成药也是各家药铺经过同行集会誓约按传统

方剂加工配制，必须认真拣选地道药材，炮制虽繁，绝不能省人工。品味虽贵，绝不能减物力。特别是一些蜜丸的制作，都要经过蒸、炒、煨、烫、制、浸、霜冻等四十九道工序。搓制成丸后，还要存放相当时间，待燥气去净，药味纯真，才可出售。因而，聊城这几家大药铺，所出的成药名噪一时，确有疗效。如同德堂的灵宝丹、万应锭、拨云散眼药、阿魏丸、福寿堂的安官牛黄丸、治疗高烧不退的“紫雪散”比打针还快。怀德堂的人参再造丸、大活络丹、局方治宝丹、牛黄清心丸。益寿堂的参茸保肾丸、紫雪丹、鸡肝散等等，至于普通丸药如六味地黄丸、藿香顺气丸各家种类繁多，应有尽有。外地成药除北京同仁堂犀黄丸、小金丹及薛家万应保赤散外，本店自制不下一二百种。

这几家药铺的货源，少数是从济南购买，

多数是向全国最大的药市——祁州药王庙会（今河北安国县）去采办。这地方盛产药材，清代以来直到民国年间，一直是华北药材的最大集散地。北京、天津和全国许多地方的大药铺，都定期到那里办货。每年春季旧历四月，秋季十月，以该地药王庙为中心，定期开市。这个全国闻名的祁州庙会，除当地农民把自己种植或采集的中草药拿到药市出售之外，各处药商也把不同地域出产的著名药材大批贩运到祁州庙会，转手出卖。

祁州庙会开市之前，聊城的几大家掌柜，带着伙计们，专程前往。他们预先租下“下处”，雇用厨房，实行临时集体联合，通力合作，分工办事，竭力拉拢人缘关系，抢先购进质量优良的药材，然后大家作合理分配。为了求货品地道，他们还常常派人去辽宁、营口药市，购买东北的上等人参、鹿茸，去四川买麝

香、贝母、黄连、川军等上品货；去菏泽、洛阳采办丹皮等高档优质货，这样炮制出的膏丹丸散，疗效甚高。

五

所谓“坐堂先生”，是药铺里聘请来专坐在铺里应诊的医师。这是为便利病家，在同一个地方，既看了病，又抓了药。民国时代东关的同德堂曾聘有张振清先生、孙竹亭先生。仁和堂聘有姜春暄先生。这位姜春暄先生名树堂，蓄浓密的仁丹须，人们背呼“姜胡”。他还擅撰讼状，不收现金谢仪，有人送钱就让人家给买部书，因此他的医书积藏很丰富。如藏有“皇汉医学丛书”、“图书集成医部全部”等大部头巨帙。姜先生后返故里博平，抗日时期下乡参加八路军的医疗工作，在一次战役中不幸殉难。

那时，聊城城关有几位著名的中医，如王省三、孙敞臣、葛赞庭、王子良等先生皆为妇、内科高手。他们只是在家应诊，并不要诊金。几家药铺每天抓出的药，多是这些先生的处方。每年的端午、中秋、年底，药铺都分送资金以酬答。至于农村的中医先生，也有自己不开药铺，只是义务应诊，随便病人去抓药。城关的大药铺每年三节，也都分送礼物，表示谢意。如前罗村擅针灸、内科的李复元先生、刘营擅眼科的刘体仁先生等。

清末，聊城城内胡煜堂先生精于外科。不卖药、义务为群众看病。性淳厚，乐善好施，求治者多远道而来。先生辨证施术。应手辄效。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楨亲书对联赠之曰：“唯有仁心得仁术、不为良相作良医”。又，城南钱家楼村，昔有钱家桓先生，为中医界翘楚，善“太素脉”。诊断可决定其人终身的穷通寿夭。好

象聊斋上所谈“董生”故事那样神奇。

六

以前，无论什么店铺，雇用的人员，统称“伙计”。这“伙计”二字不是轻视的贬词，而是含有一种倚重、相辅为理之意义。药铺当伙计，有什么待遇呢？这里，不妨把石贵鑫的谈话抄录于下。（石为陕西省华阴县人，于光绪三十二年来聊城入“东益寿堂”当伙计，后任经理）他说：“东益寿堂”药铺，是当时山陕两省开设的较为著名的六大药店之一，（那时全城中药铺有二十余家）流动资金五百两白银，全店三十二人。前后有五栋楼房，西楼最大，六进大院，过道四间。另有瓦房五十二间。建于前清同治年间，是“山陕会馆”的买卖之一。经营方式批零兼营，批差30%，零售50%，年经营额约计折人民币二十四万元左右

右，人员待遇（除管饭外）学徒每月一吊钱，出徒每月两吊钱，帐柜每年六十吊，四、六分红。凡本店人员供职到六十岁，即可以离职休息，工资照发，去世后继续照发六年，而且允许顶替，以少换老。

石贵鑫又说到：“那时的山陕会馆，每年的正月初一、五月节、八月节，凡是山陕两省在聊城的商户，都去会聚一堂，交换行情，洽谈业务，交流经验等。还要上供、磕头、祭奠神灵，以祈保佑生意兴隆，顺利发财。每一节日都要演戏三天，任人观赏。会馆由书业德、德生庆、广泰号、怀德堂、益寿堂轮流值年。”

聊城地名初探

孙元芳

聊城为鲁西重镇，系古老的县城。早在新石器时期，原始人群就在此定居。其村落乡镇命名的原因颇为繁杂。现据可考史料试略述其特点，愿与有此兴趣诸公共研讨。

元末明初，战事纷纭，灾荒病疫，民不聊生。鲁西一带人烟稀少。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谕旨迁民。移民们扶老携幼来到这荒芜的地方，住下来耕养生息，逐渐发展为村落、乡镇。其地名便以最早到此或人丁兴旺人家的姓氏称为某庄。如，张庄、周庄、赵庄、杨庄、唐庄等等。有的兼营某一副业，地名便以此而起，如张炉集，原一张姓移居此地，开始称张庄。后

来此地形成集市，该张姓居民在此建一茶炉卖开水，此处便慢慢改称张炉集了。李海务镇所属的周店是因为一姓周的居民在此开店而得名，沿续至今。

以姓氏命地名，是聊城各村镇地名形成的最广泛也是最简单的方式之一。

穷苦的劳动人民除从事农业生产外，也有的以擅长某种手工技艺逐渐在周围小有名气，原用地名很自然的随之变化。如西王乡的西王村，开始称王庄，后因有长于挫骨头器具手艺的人在此落户，曾更名为挫骨头王庄。最后演变为现在的西王和东王。以此特点相似定地名的尚有于集乡的算盘韩、沙镇的刘铁匠、张炉集乡的毡张、斗虎屯镇的烧饼赵庄、堂邑镇的粉干李等。

据传，明燕王南征北战时，率兵至聊城，因战事暂息，便将此处一些土地分给一些小军

官，率兵耕种，有屯田养兵的意思。久而久之，此地便以该军官的姓氏命名，因系屯扎大都称屯，如蒋官屯、王官屯、马官屯、梁水镇的郑屯、张屯、邢屯等等。

封建王期的皇帝，大、小官员的一句话或一件事也成为地名形成的一个原因。如梁水镇，长期以来称梁浅。其因是：古代梁氏家族在此居住。清康熙皇帝沿运河南巡至此，因水浅搁船，康熙帝说了句“此处水浅”，便命名梁浅了。

因靠近河岸或沟渠，或因地势状况而与居此住户姓氏相连而形成地名的也不少。如沙镇的耿海，朱老庄乡的新城海，西王乡的聊堤口、姜堤、古楼街道办事处所辖的龙湾和阎寺镇白洼村等等。

因建有寺院、庙宇或在当时当地有一较大建筑物，也往往与该地住户姓氏相连命为地

名。如沙镇的丁楼、朱老庄乡的三觉寺，许营乡的李楼、于庙等。

以官宦大户的乡庄、墓地命地名的也有，西王乡辖的傅坟，古楼街道办事处辖的邓园，柳园街道办事处辖的窦营等便属此例。

以人名定地名的情况也不少，如梁水镇的任老九、王东渐，许营乡的李朝成，李海务镇的葛海，西王乡的王光宇等。

聊城所属各地地名形成或命名的原因和特点，上述归纳的几条，甚不完善，尚需进一步研究。下面将笔者了解的聊城地名中有关神话传说及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里所受欺辱而形成的几个地名作一介绍，意在为聊城地名研究扩大点影响。

道口铺这个地名是穿插了神话传说演变而来的。据传，隋朝开皇年间，堂邑（今堂邑镇）设县，该地是堂邑至聊城，沙镇到梁水镇的交

叉路口，是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必经之处。村人曾在此开铺，但尚无地名。某年，一道士带犬路过此地，身上所挎宝褙丢落，其犬发觉即停于此处守之。怒目竖耳环视，行人不敢近前。数日后，道士发觉，急回此处，见犬死，宝褙伏于身下。道士念其犬忠，葬于此地两里许，並诵经超度。此地即定名为“神仙度狗铺”。至清朝中期，谐音神仙道口铺，因此地实为道口，清末民初简化为道口铺，至今。

候营乡所属的活马店村，地名由来更具神话色彩。清光绪年间，有一过路人用车拉载着一匹死马经此，马忽然转活，故得村名活马店。

许营乡的大石槽和张炉集乡的前、后石槽村，据说是上大水时冲来石槽，停在村旁而得名。梁水镇的石槽王村，地名来历的传说更为离奇：明朝时移民王姓居此种菜为业，命名王

家园。到清朝中期，有一鬼怪驮一大石槽经过此地，村后有一拾粪老人说了句不吉祥的话，此鬼怪即被石槽压死。故改村名为石槽王。

因神话传说而得的地名，既反映了封建社会人们的愚昧，也体现了处于困苦中的劳动人民的良好愿望。在恃强凌弱的社会里，能有一个象道士的狗那样的家犬，来保护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也是一家的幸运。大水能冲来石槽，饲养的牲畜可死而复活，也是穷苦的劳动人民渴望获得生产资料的象征。

然而，有些地名也是封建统治者欺辱劳动人民的见证。张炉集乡的细马庄，原名杨庄。不知哪朝的一个皇帝途经此村，曾在这里停留拴马，不料那马突然病死。好端端的一个杨庄，便以钦命，被迫改称“死马庄”。年代久远了，人们便以谐音改称细马庄，至今。现由柳园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刘扒庄，村名的来由则充

满了屈辱和辛酸的泪：明洪武年间，刘氏自山西洪洞县迁此立村，初名刘庄。至清末，村民刘黑堂同外村人赴县衙辩理。刘跪于堂下，因距县官远，便跪着向前爬行听审。此事传扬出去，被人谑称为“刘爬庄”。后又将“爬”改为“扒”，但又怎能抹去这受辱而改村名的原意？距堂邑镇驻地东南3公里的刘黑塔村，村名是这么得来的：明初，此地名刘庄。后来身材高大魁梧的村民来县衙打官司。县官见了此人说了句：“这人好象一座黑塔”。遂更村名为刘黑塔，至今。新区街道办事处所辖的王卷帽村，有这么个来历：清初，此处住一王姓老人，常戴毡帽，帽沿上卷。有一年他去完粮（交纳农业税）偶遇县官，问其住何村？老人回说：“住处无名，请给定名”，县官便以其帽状，命此地为王卷帽村。

道口铺乡和朱老庄乡各有一个四家李村，

其来因是：明初，李公鸡、李公鸭、李公凤弟兄三人自山西洪洞县迁来。大哥李公鸡居今道口铺西立村，二哥李公鸭在今朱老庄乡南6里处住下来，老三李公凤在今阳谷县北定居。其四弟李公鹅留居洪洞县。为纪念这历史的分居，老大、老二的村名均称为“四家李”。

朱老庄乡的宓郎庄，原名宓庄。后因自然灾害，村民大都出外逃荒要饭，回来后，此地仍因地碱，庄稼难以生长，人们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实在无法交纳当时统治者的地税公粮，改名“没粮庄”，以应付当政者的逼迫。解放后，人民政府领导此地村民治涝改碱，多种经营，“没粮庄”的群众有了粮，丰衣足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再不能叫“没粮庄”了，便以谐音，改为宓郎庄，至今。

同全国各地地名形成的情况一样，聊城市所辖各地地名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地形

的、政治的原因等等。随着历史的进展，地域区划的变迁，地名是不是也必须根据需要加以改革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地名的改革应该尊重历史成因，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地名有利于鼓舞人们为建设自己的故乡而奋发、创造。例如，城北苦菜刘，建国后改为库财刘等。根据这么一个原则，结合当地居民的某一特点，在我们这一代对聊城地名加以改革，这是很有意义的。

笔者对故乡的历史和地名的演变仅粗知一、二，其中定有许多错讹之处。斗胆写一写，目的在于敬请知情者矫正，补充。如能抛砖引玉，使聊城市地名研究工作更深入一步，便如愿以偿矣。

1987、4、10

聊城关帝庙琐谈

高金福

解放前，聊城城里城外，大庙小庙很多。大庙如几座会馆、文庙、城隍庙、铁塔寺等，建筑规模宏大，造型美丽壮观。小庙只在住屋墙上，挖个小洞，供一尊神，可以说小到极处了。因而，素有“东昌府庙多”之称。

关帝庙供奉关帝。关帝，乃是三国时代的蜀将关羽，在我国老弱妇孺，尽人皆知。这是由于《三国演义》宣传、推崇造成的巨大影响。加上舞台上的三国戏，如《古城会》、《过五关》、《水淹七军》、《华容道》等，都把他形容得忠义凛然，武艺超群，而受到万众敬

仰，以致“庙貌遍天下”。清代雍正皇帝说过：

“关帝庙食遍薄海内外，其地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陬海隅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君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禳敬畏瞻依，凜然若有所见”。（见《日下旧闻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关羽一直被认为是忠义的代表，被称为“武夫子”、“武圣人”，给世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二

关羽身后荣誉，为历代历史人物所罕有。他的平生经历，据陈寿《三国志》蜀书中《关张马黄赵列传》所载：“关羽，字云长，本名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

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座，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建安五年，羽归于曹操，于白马坡斩袁绍大将颜良，曹操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后挂印封金，又回归先主刘备。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曾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羽死后，追认羽曰：“壮缪侯”。

关羽的事迹大致如此，通过小说戏曲的渲染，那就神奇多了。几百年来，群众都认为他是顶天立地、至高无尚的尊神，权威广大，能免灾降福，惩恶扬善，元、明、清历代皇帝，迭加“协大天帝”、“中天玉帝”“忠义神勇伏魔大帝”等显赫封号。在聊城一带，民间俗称“关老爷”简称“关爷”。河北等地称“老爷”、“关帝”、“关圣帝君”，即由历代封号

而来。记得有一幅对联曰：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

关羽的老家古解州，就是今天山西省的运城县。山西人在外地盖的会馆，都是供奉关夫子。运城的常平地方，有他祖坟，当地关姓人家很多。

三

聊城有两座规模宏大的关帝庙。一在东关运河西岸，即“山陕会馆”，建于清乾隆八年癸亥（公元一七四三年）。这座会馆是山、陕两省旅聊经商店铺集资创修。作为同乡人集会议叙、游息的场所。山门形势雄巍，斗拱层叠，飞檐翘角，旗杆对峙，十分壮观。山门内有戏台，左右有侧门，钟鼓二楼。正殿、北殿、南殿。南北看楼、碑亭、春秋阁、花园、旁舍等，亭台楼阁及附属建筑物大小一百六十

多间。全部建筑总体布置紧凑，富丽堂皇，连接衔接得体。各个殿阁亭榭，都是雕梁画栋，金壁交辉，十分精致，极富民族传统艺术之美。全部面积达三千三百一十一平方公尺。

正殿中，一座雕镂细致的神龛，供奉关圣帝君木雕神像。他身穿刺绣的滚龙袍，留金冕旒。像高三米，威丽端庄，俨然帝王形象。两旁神龛有周仓、关平神像，神案前顺序排列大型五供（香炉、蜡台）高达数丈，全为典铜铸造。从前，每年除夕两只蜡台插上定做的巨烛，点燃起来，从年三十到元宵节，日夜照彻永不熄灭。五供之后，竖立一柄青龙偃月刀，刀杆中间斜挂一口长剑，纯为精钢炼铸，装饰精丽，锃锋夺目，每年的五月十三日，是关帝过江会吴“单刀赴会”之日，这刀和剑都有专人擦磨一次，并唱戏三天。

山陕会馆是聊城地方的一座最大的关帝

庙。从创建今迄已历二百四十多年的悠久岁月，如今成为聊城地区博物馆，建筑物大体完好，内部陈列着丰富的革命历史文物，庭院内松竹并茂，恬静宜人。过去的匾额，部分犹存，石刻楹联尚保持原貌。

除山陕会馆外，第二座大型的关帝庙在西城。庙是依据西门城墙而建，城头上和城根下各有一座，规模都很阔大壮观。城下庙门朝东，进庙后右庑下塑有赤兔马一匹，比真马还高，造型神骏修伟，扬鬣奔蹄，似要腾蹕奔驰、旁有马僮控持。左边就是登城的跑道，可以上城眺览。大殿南向，关帝是铜像，高五尺八寸，“王之德容威状，又焕然可睹，巍然可仰矣”。神座下有灵签及药方签各一百号，终年香火甚旺，从正月初一五更起，男女香客前来烧香求福讨签许愿；上供磕头者，络绎不绝。庙内有正殿、偏殿、两庑、戏台，环境幽静，建筑紧

凑壮观，有道士住持，内外清洁，院宇深邃。

西城下关帝庙创修在何年代？西城上关帝庙创修在何年代？两座庙是否同时并建？这个问题还找不出根据和文献记载。聊城县志（宣统二年版）艺文志中，有三篇碑文记述重修。第一碑文是明嘉靖十五年“穆孔暉题灵义勇武安英济王铜像碑记”，穆孔暉（一四七九——一五三九）堂邑县人，明宏治举人，正德进士，嘉靖间任吏部侍郎分司南京。写这碑文时他已致仕（退休）归里，“杜门静养、与世相忘”时年五十七岁，家住堂邑兴泰集。这个碑文所说的帝君铜像，正是西城下那座关帝庙，名“义勇武安王庙”。文中提到“所以祀关者久矣，元碑已为金大定乙己岁重修，自金迄元又百五十余岁，天历元年又加封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至今盖重修者又累矣……”可见这座关

帝庙至少在金代大定以前早已建立，铜像就在大殿内供奉。这尊铜像一直保持至民国后，不知毁于何时。

另一碑文是“张凤翔重建关圣帝君庙碑记”，时间在明崇祯十一年。撰文人是明末有名的张兵部，堂邑人。这时已“服官归里”，碑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敷陈称颂词藻，推崇帝君的忠义及显著的功烈。开头就说：“余郡西城帝君庙成规恢壮丽，较昔不啻倍蓰……”可见是城墙上的庙，从前规模不大而又扩建的。

“是役也经始丙子年庚寅月，落成戊寅年丙辰月，计前后殿宇廊庑凡十六楹……”说明了重修时间是崇祯九年（公元一六三六—一六三八年）及殿宇数目，并列首倡及募化人姓名。

第三碑文是：“刘煜重修西城关庙记”，时间为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距上次又经

过了一百九十年。碑文说：“今上御极之七年夏，余奉恩命来守东昌……郡之关庙居西城上……”。这里明白指出是城上的庙了。继而从他“肃拜既毕，周视内外，见殿寝门庭墙颓瓦谢，梁栋榱题半旧凋落，为喟然者久之……”，继而述到“擒逆滋乱”由关帝显灵吓退“贼”兵之事，后来就“鳩工庀材，凡六阅月而葺事……”。又据县志“建置志”记载，这座庙历代修缮情况是：

“关帝庙……一在西城上，元天历己巳，东昌总管达鲁花赤伯颜不花修，明嘉靖间重修，穆孔暉有记。崇祯十一年重修，张凤翔有记。天启二年白莲妖起，国朝乾隆三十九年邪教王伦之乱，并著灵显，城赖以完。乾隆五十九年中丞福宁，首捐廉俸，飭知县科普通武重修。道光九年知府刘煜倡修有记”。

如果根据这三件碑文来说，很可能全是指

的西城上的关帝庙。至于城下的关帝庙，或是同时建立，系一整体。铜像有的说在城下的正殿内，也有的说在城上庙内。

至于所说的“显灵”，民间颇有些传说。说是某年“小阎王”（疑指王伦）反，兵临西城下正要进攻，忽仰望城头一赤面大将挥刀怒目而立，认为是关帝英灵震护，都纷纷退去没敢侵犯，城得保全。又有一次白莲教造反攻城，撒起纸人纸马，鼓噪前进。也见到关帝显圣，在云端中骑红马出现，青龙刀一挥，纸人纸马狼籍坠落，惊溃而逃。封建统治者，利用关帝的浓厚忠君思想，以此制造迷信传说，以巩固其封建统治势力，使人民慑于“神威”，不敢揭竿造反。

西城内的两座关帝庙，已随城墙的拆除而毁灭，庙中的灵签和铜像，碑石、匾额、楹联以及其他文物亦随之覆没了。

四

聊城城关各街巷的关帝庙大小不一，各具特色。山陕会馆和西城两处，是大的建筑，殿堂广阔，饶有花木之盛，犹如古刹。中型庙宇也有好几处，较著名的是“三义宫”和“赤帝当阳”。

三义宫在东城门外，背西向东，与“鲁仲连台”隔河相望。庙建在东面城墙之下，和城头的“二郎庙”上下掩映。苍松古木严如山林。朝东山门高耸，右额“三义宫”三字，为入城必经之路。庙内向南，正殿三楹，塑刘、关、张三像，神态威严，造型生动优美。四壁精绘桃园三结义及破黄巾图画，极精致。民间习俗凡是拜把兄弟，换帖都来这庙里，在神像前焚香盟誓，叫做“义结金兰”。

三义宫院宇很宽广，里面有算卜的，押诗条

的，下棋闲玩的，做小买卖晃旌的，环境虽近通衢但很幽静，犹如泰安的“岱庙”。民国后，曾在内设立“三义宫”小学，建筑年代不详。

“赤帝当阳”也是一座关帝庙，庙在东关运河西岸，清孝街南头，有山门、正殿、院落。山门向南，门外木牌坊一座，刻书“赤帝当阳”四个擘窠大字。庙的前后有好几株古槐，夏日浓荫遮日，绿枝伸展，凉爽宜人。这座庙有两幢殿宇，前供刘备，后供关帝，皆为高大泥塑神像，因牌坊上的字，人们习惯把这一段地方也称为“赤帝当阳”了。传说庙建于清初，牌坊上的大字为任克溥笔迹。

“三义宫”和“赤帝当阳”仅次于西城的关帝庙，庙中虽然有玄德公高据主座，但人们所尊崇对象仍以关帝为重。

五

聊城还有许多关帝庙，被人们用口语赋予了更为通俗的名称。这其中包含了命名之意义或冠以地名，或内含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东门里往北走，紧靠东面城墙叫做“北顺城街”。有座关帝庙背城依壁而建，面西有古棚延伸，后为正殿，神像绿铠锦袍，气象严肃威赫，正是关帝，庙门有横匾题曰：“槐花庙”。

无论小说或正史，查一查关帝一生事迹，除了演义上“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可以身边接触到大片的芳菲桃花之外，其他经历却很少提到与树木发生关系的，这座庙为什么叫“槐花庙”？大殿里有一通小碑，专记述此事：

这里从前是有庙的，可是小的可怜，只几块破砖砌为一个小窝窿，里面供上一尊长仅

数寸的“小关爷”。平常日子，香烟冷落，只是逢年过节，附近人家才来烧一柱香，供碗扁食。

一年的夏天，久旱不雨，地里的庄稼多半枯槁，眼看收成无望，灾情严重。人民盼雨，如饥如渴，农村中有很多人抬着泥龙和关帝泥像，锣鼓喧天，法螺鸟鸣，来街游行祈雨。男男女女挤满了街巷观看，小孩子们从没见过这样的新事物，总是感觉新鲜、好玩。北顺城街的孩子欣赏“祈雨”的热闹场面，并知道给关老爷上供磕头就可以求下雨来。他们就聚到一块，商量“咱们也祈雨、多么好玩”。几个孩子拍手欢呼祈雨！于是各自回家拿香拿黄表，搬个小凳子，搁到小庙前当供桌，并折了柳枝，编成圈圈戴到头上，这祈雨的阵势布置完成，将要焚香叩拜，忽然一小孩子喊道：

“我们还没有东西上供呀？那怎么行？”大家

这才觉悟，没摆供能算敬神？供几盘几碗，那里去治呢？大家发了愁。这时正值六月，忽见路旁槐花金黄灿灿、鲜艳夺目，孩子们便拍手欢呼“采槐花上供呀，关老爷一定很喜欢！”。于是爬树摘取，供桌上堆满了鲜嫩的槐花，清芬扑鼻。一群孩子焚香叩拜，祈祷关老爷快快降雨，想不到真个惊动了关老爷圣驾，下了一场透雨。

正在这个时辰，江南某城有几个信仙信佛的先生，架乩扶鸾，忽“关帝驾临”，众人慌忙叩拜，乩笔示曰：“吾将赴东昌，一赏儿童槐花之宴，即降甘霖，也所以怜赤子天真之诚也”。后来，江南扶乩者专程来这里访问，得知儿童以槐花供敬，下了一场透雨之事。从那以后，重建庙宇，装塑神像，为了纪念答报神麻，命名“槐花庙”，并刻碑以志其缘由。

关于“阳谷庙”，明、清时代，东昌府为鲁

西北经济文化重镇。每届“府考”之期，府属各县的士子都集中首县聊城，参加考试。在这里考取了“秀才”，才有参加“乡试”进省考“举人”的资格，秀才和举人有文的也有武的，文的舞文弄墨作八股文章，策论、试帖诗之类，武的就是耍刀枪、骑马、射箭，比试武艺。因而，东昌府属也出了很多的武进士、武举人，并有一名武状元，所以那时代以武功科举仕进而有成就的人物，也足以光宗耀祖，为世称赞。

“阳谷庙”传说是阳谷县人到东昌府参加府考的武秀才们出钱修建的。这座庙在东关粮食市街，向南去的胡同南头，庙宇小小一间，前伸敞厦，内塑神像五尊。当中是关帝，左右除周仓、关平外还有两员文官，这是别处关庙中少见的，文官是何人？就是同关公守麦城殉难的王甫，赵累。当年关公刚愎自用，不遵军

师孔明先生的战略方针，疏忽大意失掉了荆州，败走麦城被害，这两员辅佐他的文官，也义不屈节壮烈同死。今在阳谷庙陪侍帝君共享人间香火理所宜然，至于该县的武秀才们，为什么在这里建庙？传说是在多年前，此处有跑马场，每届府考前，应考的各县武生，都住在这里练习骑射，阳谷的武生与人争执地盘，集资买下了这一段地方，便利住宿与放马，后来盖了这座庙，以县名命为“阳谷庙”。

阳谷庙朝北，庙筑于高台基之上，也只可从下面瞻望神像，进不去人的。民国后依然存在，此间柳溪环绕，景色清旷，庙前为东南乡上街必经之路，以前因庙存在未毁，人们习惯地把那一段地方，也叫为“阳谷庙”了。

六

城内“万寿观前街”西端，路南住家宅外

垣墙上，砌着一个石头篆刻的狮子头，狮子头上，又挖壁修成一个小庙，这就是颇有历史口碑的“狮子头上一座庙”了。后来，这个狮子头垣墙的背面，又生了一株枸杞，枝叶纷披，十分茂盛，从墙外也能看到，于是又有“石狮子、活尾巴”之说，庙内也是关帝，前面靠街，行人络绎。扬名中外的“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楼”就在路北。

此处“狮子头上一座庙”，有一段民间神话故事。虽属无稽之谈，无从考证，也颇使人联想往古历史的种种神秘轶闻。公元九百九十二年即宋太宗淳化三年间，那时的聊城在今治的东南十五里巢陵，叫做博州。有一年洪水泛滥，巨波骇浪，汹涌横流，把官衙居民庐舍，漂没一空。地方官使君羊公，猝遭巨变，急率军民堵截、防御，奋身与洪水搏斗，终因水势凶猛抢救不及，羊使君既痛千万黎民百姓流离失所，

又悲恸地方糜烂已成一片泽国，他忧愤之下投水殉难。这次大水的暴发原因，是怎么回事呢？皆因博州州衙前的石狮，年久成精。一旦怒睛暴红，大水随之发生，接着又出现了两条孽龙，相助肆虐，于是翻江倒海造成了空前浩劫，这就是地方历史有名的“狮子红眼陷旧州”事件。

祸患发生后，上帝震怒，派三霄娘娘拿了两条孽龙，拘羈一地，年久化为丘陵，即今之“二龙山”（在东关猪市街南，已毁）。那只狮子同时被捉，镇压于昊天阁下（即万寿观），使它全身蹇伏，只露一头在外，永远禁锢它活跃，这好比孙行者被如来佛压于五行山下一样、有符咒箝制，只好老老实实在此忏悔苦修，以赎前愆。日久却也安稳无事，但附近居民还怕它冥顽不驯，才又在它头上盖了一座小庙，由关圣帝君镇慑。

“庙上庙”，是在东关大街路北，紧对通往丁家坑的“竹竿巷”。庙也是倚墙而筑的两层小小庙舍，只可瞻仰，不可进人。外貌形式是双庙重叠，又非楼阁，因此人们呼为“庙上庙”。久之，连那一段地名也叫“庙上庙”了。庙的下层有关帝塑像，庙的外面正是车马辐辏的通衢，为聊城商业繁华区长达三里的东关大街的中心地带。

上面的庙是什么庙？传说不一，因为庙在寻丈之高，庙虽小而深邃，站在下面是根本看不见的，于是众说纷纷，乱加猜测，但多是凭空臆造。县名中医李复元先生介绍说：“庙上庙上层小阁内，有一尊高达二尺许的赤铜神像，纶巾野服，道貌岸然，三络黑须，神态潇洒，端庄，双目炯炯，透露凜然正气，不可侵犯之概。这位神像是谁呢？就是三国时代〔走马荐诸葛〕的徐庶，元直先生也。传说、汉献帝

初平二年（公元一九一年）袁绍领冀州牧，委派曹操去作东郡太守。曹操莅任后，巡视所属各地。聊城也在东郡统辖之内。徐庶那时正在此地做县令，为了对这“上级领导”不得不敷衍，也只好予以场面上的应付，临走时，特在城外设宴祖饯。曹操那时代官职不大，势力不强，还没有显露出他那奸雄风貌。这庙上庙地方，即是当年饯别曹操之处，昔日乃城外十里野亭，云云。”李复元先生又说：“这个故事显然为后人附会，三国时的聊城并非今日聊城之所在，为了迁就历史，怎样说也不必深究了，庙上庙供奉徐庶像，也就是为此传说而点缀古迹。这尊铜像雕铸精致，生动，衣纹、曲线、面目表情，都极合艺术要求，可惜在民国十九年，被人盗卖给基督教会的外国人，听说已带往美国去了。”

七

从汉代直到清代，历代帝王出于维护封建秩序的需要，对关帝的忠义、神、勇极其推崇，加冠晋爵，迭加封号，把他和孔圣并列，这在古今名将中，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元朝末年，有一首诗对他歌颂曰：

人杰唯道古解良，士民争拜关云长。

桃园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与王。

气挟风雷无匹敌，志垂日月有光芒。

至今庙貌盈天下，古木寒鸦几夕阳。

如果说关帝已是位极天神，庙食薄海，那么所有建庙之处与塑像之地，人间香火当享用不尽，生活绝不可能如人世有穷富的顾虑了。然而，还不是那么一律如此，聊城竟有贫富两关爷的奇闻。

山陕会馆九九八十一间大殿，盖得巍峨壮

丽，金壁辉煌。正殿中的关帝，冕旒龙袍，俨然帝王，可谓富贵已极。但是，他的同一行辕只隔一道河，就有另一关爷、穷得屋破衣敝十分困顿，咫尺之遥，两相对照，犹如天壤之别，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原来在会馆的斜对面，运河东岸，也有一座关庙。这座庙孤零零只是小小一间，既无大门更无院墙，南无居邻，北无旁舍，门外是河涯人行道。周围是树木荒野，因为没人照管。香火稀少，日久墙剥瓦裂，神像颓败，附近村人只在过年时，来扫除一下荒秽尘土，烧香点支蜡烛，算是应景过年啦，这小小破庙的大门上，每年元旦都要贴上新对联，而且对联辞句年年相同，从不更换，写道：

河东河西两关爷，一穷一富。

沟南沟北双眼井，有苦有甜。

对联的下句是指的小礼拜寺街北头一条水

沟的南北，各有一面水井，虽距离很近，但水质差异。南井甘冽，居民汲食，北井咸涩，用以熬盐。这却是实地相对，恰恰巧合，至于这幅对联出于何人之手？上年纪的人也说不上来。

八

聊城的关帝庙，大街小巷，也有百多处，这是专庙供奉的。别的庙虽有其庙的主神，也往往带上关公，并且把他奉为正座，（如土地庙，上关下财之类）至于住户人家的画像，都有关帝，那就更不计其数了。所塑的关帝形象是根据《三国演义》所描绘，多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美髯垂胸，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而其他庙中状貌，也不尽同，有的双手执笏，袍服端坐，有的斜披战袍，露出锦铠；有的手执春秋，斜坐凝读。东

关前菜市街路北，有小型关庙，神像左颊有黑痣七粒，不知何所根据，别庙则无。

“公仁堂”在城内西南隅一个很僻静的角落，那地方远隔闹市，南邻城墙，水木清华，十分清幽凉爽。公仁堂大门朝东，进大门一溜甬道西行，两侧花木扶疏，碑石点缀，颇有园林之胜。再进重门向北，又一院落，正殿有神龛，供关帝神像，别的房舍也陈设得朴素清洁，几案无尘。四壁名人字画、环境雅趣，这真是个休息品茗的好消遣之处，公仁堂是本城士绅名流，集资筹建的一个公共休息宴叙之所。常常架几扶鸾，召神请仙，也印些劝善书籍施送。但无什么会道门之类的组织，也无什么宗教信仰。有如“道院”、“十字会”之流，也似乎施舍过粥饭、药物于穷人。是庙，却不象庙。不象庙而有神，神以关帝为主体。院内有横幅石刻文字颇长，句有“为吕仙驭鹤

跽云之处……”。可见除关帝外还没有蓬莱仙阁，供吕纯阳仙人休息，但总的说来，实际应用还是这些董事先生们业余文娱活动，喝茶闲聊之所。

公仁堂关帝庙神龛两旁柱子上，有一幅龙蛇飞舞狂草字体的楹联，落款是“关云长”，据说系由乩笔书写的。

关帝这尊神，道观里有他（如玉皇阁有关帝殿），佛寺里有他（如静业禅林也有关帝殿），不道不佛更有专庙。商人奉为“武财神”，农家虔诚向他祈雨，广大人民认为他能驱魔除害，求福祈愿。至于唱戏的舞台上表演关公形象，既要勇猛威武，又要刚健凝重，在旧社会扮演关公的演员，还必须遵守一套含有迷信色彩的清规戒律，以示虔诚恭敬。但是，聊城山陕会馆，连关公戏也不准演，以为帝君在殿必须严肃，哪能在戏台上随便扮演唱做？

因此，会馆里历年不敢唱有关帝的戏。传说某年某军阀驻聊，悍横不讲道理，召戏班在会馆唱戏，特点“走麦城”。他设座大殿观看，戏台上锣鼓刚敲，演员尚未出场，大殿内桌围、布幔突然起火，神座前大方石自动掀开，伸出巨蛇之首，大如栲栳，一股腥风扑向那个军阀首脑，当即惊晕倒地，顷刻蛇已不见，军阀昇回而死。事后哄传远近，以为关帝显灵云云（见《聊摄从谈》）。这事，事涉荒诞，但也可见人们对关帝崇信印象之深。

聊城的关帝庙多已毁坏，甚至痕迹全无，只是“山陕会馆”还保存全部建筑群，可作为乡土历史及民俗的见证。

闲话龙湾“静业禅林”

李震旭

(一)

聊城东南三华里紧傍运河有一座村镇，因它地处运河的南北曲折拗弯之区，蟠屈犹如虬龙，取名叫做“龙湾”。小镇东南角，有一座古老寺庙——“静业禅林”，当地人们多简称为“静业林”。据残碑记载：“静业禅林”创修于明代，清嘉庆年间扩建，是地方上颇负盛名的丛林古刹。

这座寺院，山门朝南，高高矗立，鸱尾翘檐，气势巍峨，门外两棵大杨树，粗可数人合抱；几株垂柳，南有荷塘，景色清溢，进入山门，有前殿、正殿，殿宇宽敞，规模宏大。另

外还有偏廊、僧舍、斋堂、知客室、碾屋、磨坊、牛马棚等房舍。再往后就是“藏经库”了。院子里，花木扶疏，幽静阔爽。前殿的东山墙，薜荔密布（俗称“爬山虎”），蔓壁而生，十分繁茂。前院栽有海棠，树干粗，开花时红艳芬馨，点缀的春光绚丽。

前殿供奉关帝，法身高达丈余，彩塑装金，肃穆威严；周仓、关平两将，分侍左右。正殿塑像三尊，为释迦、文殊、普贤。前殿和正殿东西两壁，都有描绘精致的壁画。生动清晰，活灵活现，有的是三国故事，民间传说；有的是十八罗汉、佛经典故。

寺内的“藏经库”珍藏佛经千数百卷，皆是元、明珍本、抄册，曾有聊城基督教牧师，美国人要求方丈瞻仰一下佛经，被婉言拒绝。这些珍藏数百年的珍藏秘本，是研究中国佛教重要资料，可惜都在土改时，当为迷信品，尽

悉烧毁，无一保存。

寺庙后院，牲口棚的北墙外，有大片空旷园院，建有土房多间。这是一处“丙舍”，专为寄放灵柩的。其时在聊城的各省商号甚多，历年有因病而死者，一时不便运柩返里，就把棺材寄到静林寺内，也有暂时厝于庙后墓林者，等待日后再起走。把灵柩停放在屋内，或厝在外边墓林，都均需要向寺院缴纳费用，一年交多少费也有规定。但绝不多要，只是方便客籍商人歿而难归，慈悲为怀之意。其中不乏年代久远，多年存柩无人起运的弃柩，寺院也听其久放，不予处理，但每逢中元节、阴历年时，全寺僧众，身披袈裟，手持铙鼓，喧诵佛号，到丙舍焚化纸镪，以示超度亡魂之意。

正殿前东庑内是寄存贵重棺柩之处。这些棺柩（多时达十余口）都是官宦殷富之家寄放，缴费较高，但停放时间不会很久，就先后

运走了。棺柩用大毛链锁悬挂室内，外面用红缎子缝制的棺衣包裹着，木质有楠木、香沙，最次的是柏木，都是四块瓦合成，体积轻巧。聊城解放后静业林被拆除，寺内存柩二十四口都埋葬于附近空地。

(二)

静业林，属于阳谷县阿城镇的“海会寺”，那里是“主庙”。主庙以下的各个寺庙，统称“下院”。静业林的僧人，都归海会寺管辖。这是指整个系统不容紊乱，有统一的主导机关而已。“下院”的一切行政、生产、对外关系、人事活动等等事宜，都是各自处理、自行安排。至于用度开支、财政进项，也无庸事事向主庙汇报。主庙也不加过问，唯有“方丈”一席，必须由主庙委派，如聊城南乡的“白马寺”、越河圈的“地藏庵”都是属于

一个系统，或为下院，或为下院之支院，多为独立单位，收入自行处理，不另向主庙要钱要料，历来经费自给，也不上缴。

国有国法，佛有佛规。佛门的法规戒律，非常森严，佛法许多戒律中，最重要的彻底根除“奸盗邪淫”。谁要触犯了，交主庙老方丈依法处理，直到死刑，俱不必送官究办。

(三)

静业林在清代中叶，庙产相当丰富，有良田八顷，骡马成群。僧众也多，最盛时有和尚二百多人，各有执管，井井有条。和尚除了应延请念经、做佛事外，主要是务农，但是也雇用不少“扛活”的，干寺里一切杂事。

寺院里水井、碾子、石磨等生活用品齐全，并且种有菜园。民国以后，庙产只有一百二十亩了，僧众逐年减少，后来也就剩二十人

上下，但还雇着两个扛活的。土地大部分自己耕种，只有少数叫别人耕种，有家佃户叫李永裕，住在本村。

民国后最老的方丈叫夏法缘，下一辈叫连彬，三辈叫双度、双智。第四辈上是桂山。到了桂山当家已经是一九四七年聊城解放前夕，除这位桂山外还有一位桂福，可算是静业林最后的和尚了。据说以后返了俗，还当过龙湾村的农业社队长。

庙里也收“寄名和尚”。所谓“寄名”者，是名义上在庙里挂个号，并不入庙出家。意思是已经从幼遁入佛门，得佛的庇护，可免除一切灾难。寄名和尚如果成年要在家娶亲时，事前要到庙里，表演一个返俗动作。就是从庙里偷拿一小件东西（如笤帚、筷子之类），故意让方丈看见。老方丈就拿起笤帚，劈腕打你一下子，随之你跑出庙外，回家后就算是被

庙里逐出，开除“僧籍”了。这是双方做出的一种形式。现下还有一名寄名和尚刘兰村健在，已经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

谈谈聊城灯棚

仓季明

灯棚兴起于南北朝，后来宋、明时代最为昌盛。聊城的灯棚始建于明朝初期，地址是北关“玄帝庙”门前。虽结构简单，但装璜得庙门却灯光辉煌。每逢元宵佳节，三天之内，观者甚多，络绎不绝。

聊城的灯棚跟随商业的昌盛，明、清以来逐渐兴起，直到清朝末年，达到了高峰。城内四大街口（东口、西口、南口、北口），东关大街的驴市口、馆驿口、闸口以及越河圈奶奶庙的门前、古楼东面及小街口都架有形式不同的灯棚，甚至各座庙门前都有靠壁长灯及吊灯，算起来有几十处，映照得全城灯火辉煌。

灯棚是士绅、商人捐资兴建的。灯棚的形式也各异，有的平顶（古棚式）一层纱灯，有

的二层、三层（楼亭式）。

灯棚由四根柱架起，底端埋入地下，上端架有横梁，在横梁上嵌镶着有画面的长方灯，一个接一个排列着，布满了四周。每一个画面为一个单元，内燃两支到四支蜡烛，被烛光照得画面格外鲜艳。

楼亭式的灯棚，是两层或三层的纱灯。上顶覆盖着用席钉在木架上的层页，一页页的封着上顶，有翘角四起，结构简单、轻便，联接坚固，但又易于拆卸。灯棚的中央，均有宫灯悬挂。

平顶式的灯棚，只四周围绕一层纱灯，上即封顶。灯棚内上方又点缀着几个宫灯，灯的周围都是画面。内燃六支蜡烛。1926年，聊城建起了电灯公司，灯棚上才换上了电灯。

越河圈“泰山行宫”庙前的灯棚，在聊城灯棚之中居首位。

泰山行宫，据传是碧霞元君（泰山东岳大帝的第三个女儿）的行宫，呼“奶奶庙”。盖得崇阁巍峨，富丽壮观，为聊城东关巨刹之一。每年的元宵节，庙前的灯棚，挑檐翘角，结构精巧，八面玲珑，辉煌耀目。它是仿光岳楼形式，连顶三层，蔚为奇观。这灯棚全是庙中道士高复岫的一手杰作，真可谓精设妙制，巧夺天工。此人是一个管辖全县道士的“道官”，兼善书法、音乐与绘画。

民国十五年（1926年），聊城建立了电灯公司。这一年的元宵节，城关灯棚，大大小小，有几十座，都换上了电灯，从楼东到闸口，光耀灿烂，人如潮涌，民间玩艺，一起起地如急湍奔流的小浪，锣鼓喧天，顺着大街前进，这如火如荼的灯节，民国以来，属这一年繁华火爆！

灯棚画面的绘制也反映了聊城画家们的作

品在发生着变化。最初画面是些古代绘画形式，如：打猎、飞天、松鹤以及故事片断等，次之有戏剧、小说等的故事片断，另有花鸟草虫画，多为工笔国画。后期的画面有了写意的山水、花鸟，画面内容也随之起了变化，更换的画面有的用纱，但多数是玻璃的。有些换了不少讽刺旧社会黑暗的画面，如：有一幅“提审”画着翻戴纱帽眯缝着眼，手面举着一只红绣鞋的县官，喊叫“带凶犯”，下面有两个衙役拴着一条狗走上公案的画面。题词为：“糊涂锅里煮元宵，浑蛋一锅粥”。另一幅“送礼”的画，画的是县官私衙门前，有一秀才打扮者，带领两名夫役，抬着酒、肉向大门走去，题词是：老鼠给猫捋胡子，不要命的巴结”。还有老鸦飞到猪身上——看见人家黑，看不到自己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象人等的讽刺画面。

每当旧历正月十三日各街口的灯棚就开始架设，十四至十六三天之内灯棚底下挤满人群，灯棚两旁的观者自带板凳、座椅排满了周围，一面观灯，一面等候玩艺的到来。

聊城的民间传统玩艺有龙灯、狮子、花船、高跷、花车、秧歌、大头、七巧、云彩、扛官。特奇的聊城“绳张庄”的“火虎”，用点燃着的香，密布在假虎皮上，披在人身上，两手伏地，玩起来全身有闪亮的星点，（这种玩艺只有夜晚出现）。这些玩艺儿一起起地走过灯棚，有专人放鞭炮截拦。在震耳的鞭炮和锣鼓声中，开玩起来。玩艺过完，直到深夜，灯棚周围的观众才断续稀少。另外还有座场的“八角鼓”、和“灯迷”等配合欢度佳节的文娱活动。

聊城古八景

吴运涛

八景之说，源出于宋代画家宋迪。他以湖南潇湘一带的景物作题材，绘制了八幅山水画图，题为：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此后，潇湘八景图，被视为一时佳作，流传极广。元、明两代以至清朝，八景之风广泛流传。凡是名胜地区都往往凑足八景以资点缀，如燕京八景，蓬莱八景等。

聊城八景是：光岳晓晴、巢父遗牧、崇武连樯、绿云春曙、古甃铺琼、圣泉携雨、仙阁云护、铁塔烟霏。八景，形态各异，丰韵不同，有以建筑宏巍见称，有以景色壮丽溢美，有的神话流传史乘有徵，有的气象峥嵘，多姿

多彩，明代东昌府志所载，有八景的胜迹描述，并有名人题咏。清宣统二年的县志城郭版图上面，约略标明原来八景名称与方位，至今这八景还保存两处，其余的多已残毁。为了探索地方古迹，保留乡土掌故传说，参考有关资料，访问故老忆叙，把八景敷陈如下：

光岳晓晴

城中央有座“光岳楼”。始建于明洪武七年（1734年）经过历次重修，如今仍是坚固雄伟，蔚为壮观。清代皇帝康熙、乾隆南巡路经东昌时，曾登楼赋诗、镌石流芳。整个楼阁，全系采用横斜欹零的木材，以艺术巧妙结合互相衔接构成。布局谨严、气势巍峨。楼高达十丈，分为四层，最高层矗立雕镂透花的葫芦宝顶，高耸云霄，气势磅礴，更显得古楼的庄严雄伟。

风和晴朗之晨，登楼远眺，一片秀丽景色。远瞻东南的少岱，峰峦叠翠，于云烟飘渺中若隐若现，曛曛旭日，光辉迎人，古城风姿、闾闾万家。环城水光波影，宛若江南。西望长堤如虹，杨柳簇绿，菡萏满湖，香远溢清。极目四野，阡陌交亘，田园棉麦，村舍依依，晨炊袅袅，尽收眼底。于一片繁华景象之中，又呈现无限妩媚风光。

光岳楼，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依然雄峙碧霄，整体无恙，显示着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艺术和智慧，呈现出我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光辉。因列为八景之一的“光岳晓晴”。

巢父遗牧

在城东南十五里，许营村的西边，过去有一处高出地面丈许的丘陵，这便是属于八景的

“巢父遗牧”所在地。土陵就是巢父陵。据东昌府志和聊城县志记载：“巢陵，在府东南十五里，旧聊城治十字街东南。旧聊城即巢陵城，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河决，城圯于水，乃移治于孝武渡西，即今治也”。

据传这个巢父，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位隐居高士。他不求仕进，以放牧啸傲岁月，因栖处老树之巅，故称巢父，尧王听说他有治国之才，想把天下让给他，他不答应。以后，尧王又想把这富有四海的天子爵位让给许由，许由更不欲闻，跑到颍水之滨去洗耳。恰逢巢父正牵牛来饮水。见许由洗耳，就问他为什么，许由便把尧王欲让位与他的事说了，因不愿听这言语，要洗一下耳朵。巢父说：你如果深居山林，不要接触显贵，那么也不会有人欲以爵禄干扰你了。洗耳岂不把清洁的水也弄脏了吗？别污了我的牛口！于是牵牛上流饮之。

这个故事《汉书鲍宣传》也有记载，终究是渺茫传说，后人附会。这一段地方古有巢父陵、洗耳池、卧牛坑、祭岁坪、尧王坟等古迹，1969年中国科学院的考古专家，曾到这里考察，发现此处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层，出土有汉代的麻点砖块和东汉时代的绳纹筒瓦片，这足以证明这处古代文化遗址，确有其来历。

七十年代初，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平掉。

崇武连樯

东关大街馆驿口向南是“大码头”，码头西边有块高地，是明清时代“崇武骝”的旧址。

七十年前，虽是漕运已停，但运河交通运输仍然频繁。南来北往的船只，犹如水上列车，日夜繁闹不休，真是舳舻蔽日、桅樯如林。从聊城往南方装运的土产有乌枣、贡面、

槐米、黄花菜、五香疙瘩等等。由南方各省来的货物，种类更多。如糖、茶、纸张、江米、大米、杂货绸缎之类，在这里装卸集散，码头上堆积如山。紧张而繁盛的水上运输，南北沟通的物资交流，给这崇武港口增添了兴旺景象和迷人情趣。表现出聊城的地方富庶和工商业的繁荣。“崇武连樯”这一景的命名意义，就是那时运河帆舸相接首尾不断之雄美画图。

绿云春曙

绿云春曙，是五百年前的聊城胜景之一。意思是说：在风光绚丽的春天早晨，登上绿云楼，凭栏眺望那景色美艳的晨曦。这时，春光骀荡、曙气爽神，正当旭日将出之际，蔚蓝的天空中，晓雾飘渺、紫蔼升腾、举目东望、东岳泰岱的峰峦层叠，若隐若现。四郊农野，翠浪丛簇；大运河中桅樯云集，俯瞰阡阡，万户栉

比，景象万千：胭脂似的朝霞照射着城河中碧波银帆，仿佛是用彩笔饱蘸姹紫嫣红的春晖，把东昌府古城描绘得分外妖娆。

绿云楼，是宋代的建筑，地址“在府城西隅”。当年知府衙署的西边，有座很大的花园。园中因阜缀山，因洼疏池，亭榭楼阁，花木繁茂。这园是与府衙相联，可游览、可宴客、到处清流湍洄，峰树掩映，园名“依绿”有十八景是砥斋、晚晴书屋、小玲珑洲、丽农山房、南章山房、小沧浪等。绿云楼是在花园的北面，紧靠北城墙，在翠柏荫森、岩洞幽邃之间，危楼耸起、画栋雕梁、飞檐彩椽，壮丽非凡，是“城上二十七楼之一”。从东昌府志及其他参考资料上，可看到明代许东望、张鸣鹤等咏赞“绿云春曙”和依绿园景色的诗词，真个是小桥流水、曲径通幽、茂林蔽日、修竹苍翠、夏荷盈池、秋芦似雪，好似大观园的景

色风光。

这楼和园由元明以迄清代中叶，还部分存在，经历代修葺未致全毁。降至清末渐已圯废，如今楼址已成荒墟，只有那一带仍以“西花园”作为街名了。

古瓷铺琼

这是说的一口古井内的瑰丽形象。这口井在城西北角专署门诊部西，也是历经沧桑、年久颓残，早已失掉所传说的那段风貌了。传说：这地方当年有座“清心庵”是尼姑修真养性的清静庙宇。庵内有大殿、禅室、小小后楼三楹，院内花草树木繁茂多姿。尤以丁香著名，前庭后院、栽植皆是。而且品种不一，每逢丁香盛开季节，芬芳浓郁、香飘远近、沁人肺腑。入得庵内，一种幽静清逸的气氛，使人心旷神怡。尼姑妙静，能诗善画，在本城中是

颇有名气的。

那一口列为八景之一的古井，就在庵的前院一株海棠树下，有白玉石井栏。井底也是白玉石铺砌，井水清澈晶莹，一望见底。底层有琼玉琢就的朵朵菡萏，与井壁茸茸青苔相映，水光花姿愈显优美。井水清冽甘芳，妙静常汲以烹茶，以款待来庵游览的雅士文人。

圣泉携雨

两千多年前的聊城，是在今治城西北十五里“聊古庙”。相传那地方有古代帝王颛顼的坟墓。颛顼是黄帝之孙，十岁即辅佐少昊。二十岁登帝位，初国于高阳，后都于帝邱（今濮阳），因此，颛顼墓又称高阳氏陵。

庙在颛顼墓之前，山门巍峨，翠柏浓蔽，有清代聊城状元邓钟岳写的“聊古庙”匾额。正殿中塑有这位帝王坐像，龙袍冕旒，执圭端肃

坐于蟠龙宝座，两旁有文臣武将侍立，匾是“膏泽下民”。殿后有三间两层的楼阁，还有亭榭回廊，院内老槐覆盖，竹木清华，十分幽静，有住持僧名“了僧”。庙产良沃八十多亩。

圣泉是颛顼陵墓前的一口古井。井旁有碑，就是所称胜景之一的“圣泉携雨”。据志乘记载这圣水井“颇著灵异，逢亢旱祷雨、往往沛降甘霖”。井，如今已无，庙已荡然无迹。那颛顼墓古迹亦成为略高于地面的土阜了。1978年，政府为保留这历史遗迹，在井旁碑上刻“聊古庙遗址”以志。

至于颛顼与圣泉是什么关系？据《辞源》引《尔雅》所注：“颛顼水德，位在北方”。可见这位古代帝王又成为壬癸司水之“神”，功能足以控驭甘霖润泽万方，圣泉携雨意义想系本此而言。

仙阁云护

聊城光岳楼的西南方，有一座数百年历史的雄巍高阁，它全部采用木构砖砌、双层楼台、飞檐斗拱、气势磅礴，它始建筑于古木参天荷塘环绕的海源阁藏书楼旁，几百年来，风风雨雨历经沧桑巨变而峙立无恙。这就是著名的“仙阁云护”万寿观昊天阁。

据邑乘载：万寿观前身是房老庵。明代洪武二十九年（1396）后军都督金荣奏改今名。弘治年间（1488~1505）由郡人侯宁又复扩建。那时万寿观的范围，是相当宏阔深邃。有三清殿、郁罗萧台、悬九龙钟的特室等。殿后高壁有邓状元写的“阆苑瀛州”四个大字，高逾一丈有余。兀自笔力雄遒、结构谨严。

这座昊天阁两层高楼矗立碧空。金字匾悬于正中是“仙阁云护”。未落款识，不知何人

手笔。楼上神像是玉皇，为道教所尊奉的最高天神。据道书说：“玉帝居玉清三元宫第一中位”。宋徽宗赵佶尊之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楼下神像有三，即天官、地官、水官。也是道家崇奉之神。这三尊神像，服装不同、面貌各异。但雕塑精绝，神色凛凛，栩栩如生。阁后特室有口“九龙钟”。高达二米，重约万斤，钟上镌雕九条飞龙，各具不同的形态神情。或二龙戏珠，或吻张目突，或悠然静伏，或昂首欲飞，无不维妙维肖，活灵活现。这口钟，据传是很有灵异的，逢天旱不雨，地方官就虔诚地向它祝祷，“击之辄有雨”。过去的历任知县有韩龙震（乾隆39年）郑纪洛（同治4年）吴艺畹（光绪29年），都曾因旱祈雨而得甘霖沛降。那位韩公还作了“谢雨祭九龙钟文”。郑公也因“祷雨辄应”，遂“建楼悬钟而为文记之”，俱载邑

志。如今阁已圯毁，钟也莫知踪迹了。

铁塔烟霏

铁塔不只属于八景，还是“东昌府三宗宝”之一。它在东关老运河的南岸，有名的古刹护国隆兴寺东南角。塔的创建年代，已无文字可考。1973年，政府拨款加以整修，把多年深陷地下的塔身，又挖掘出来，重新铸造了塔的尖顶，砌补坚筑，使原来十三层的浮图，又恢复了完整面貌，在拆卸未毁的五层塔身和基座时，曾发现石函。石函外陈列有铜菩萨、瓷瓮、宋元古钱多枚。函内，有小型银棺，藏有僧人骨灰和舍利子，石函外侧有石刻铭文，说明原有的铁塔，于明代永乐年间已是倒塌。以后，经过了、宣德、景泰，到了天顺年间，才由“东昌府僧纲司都纲、性深和尚和隆兴寺的方丈德宁，募缘重修。这中间已经过了五个皇

帝的更替，四十二个年头。至今，五百多年的悠长岁月，风雷摧剥、地震摇撼、又陆续倒塌，迄今始得重修。

铁塔十三层，高约三丈余。造型崇峻浑朴。塔下基座占地十六平方公尺，石刻佛教浮雕有孔雀、麒麟、龙凤及乐舞人物，各类图饰都很古雅生动。据上海同济大学古建筑学教授陈从同推测，塔的建立应在辽金，又考古学家根据它石刻禽兽和佛教人物风格来推断，当在隋唐之前。何说乃是，尚待考证。

东昌三宝之一的铁塔，多少年来，倾圮于暮烟斜阳荒蔓凄凉的景象中，而今又赋予新的生命。依然掩映于湖光波影、荷塘柳堤，饶有诗情画意。

关于征集范筑先将军史料的启事

范筑先将军是我国抗日民族英雄，生前任山东省第六区（聊城）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为护守聊城，与日寇英勇作战，壮烈殉国。为纪念范筑先将军殉国五十周年，我们准备出版范筑先将军文史资料专辑。敬请各界爱国人士、革命老同志积极撰稿。

1、凡有关范筑先将军的一切史料，包括经历、事迹、轶事、日记、手稿、函电、工作记录和敌、我、友对范筑先将军的回忆录以及当时新闻报道等，均为征稿范围。

2、来稿必须是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文章不限体裁，不论短篇叙述或长篇记载，一律欢迎。对同一历史事实或过程，可以

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和不同重点撰写。对过去已有的资料、图片或手迹等也欢迎提供。

3、来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4、来稿务请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底前寄聊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以便及时着手整理,编辑出版。

聊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月

附：范筑先将军史料征集参考要点

为了做好范筑先将军史料的征集工作，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初步整理出范筑先将军史料征集参考要点，供大家在回忆中参考。我们殷切希望革命同志、老共产党员和各界爱国人士，进一步深入、扩展、丰富征集范围，把所了解的当事人、知情人以及有关资料提供给我们。

一、有关范筑先将军生平的史料：

- 1、有关范筑先青少年时代的资料。
- 2、有关范筑先在旧军队时代的资料。
- 3、有关范筑先在旧政权任职时代的资料（临沂时期）。

二、有关我党对范筑先将军的争取和帮助的资料：

1、有关1937年党中央代表彭雪枫同志来聊与范筑先接触的资料。

2、有关1937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派12名共产党员，及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240名政训服务员，来聊帮助范筑先在鲁西北抗战的资料。

3、有关1937年12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派组织部长张霖之来聊帮助范筑先领导抗战的资料。

4、有关1938年3月，党派老红军干部袁仲贤、周紫珊等同志，及延安派共产党员柏洁民同志等来聊帮助范筑先抗战的资料。

5、有关1938年6月范筑先去威县与徐向前、刘志坚等会见的资料。

6、有关1938年9月范筑先去南宫与徐向前、朱瑞、宋任穷、杨秀峰等会见的资料。

7、有关1938年9月黎玉、张经武同志来聊带来毛主席致范筑先亲笔信的资料。

8、有关朱总司令复范筑先信的资料。

三、有关范筑先将军坚持鲁西北抗战的资料：

1、有关1937年10月范筑先奉命率部撤离聊城的数据。

2、有关1937年10月范筑先撤至齐河官庄及返回聊城的资料。

3、有关1937年10月21日范筑先去武城收编齐子修武装的资料。

4、有关1937年11月19日范筑先率部回聊发出皓电，誓不南渡，坚决在鲁西北坚持抗日的资料。

5、有关范筑先平息忠孝团暴乱的数据。

6、有关范筑先收编冠县“南杆”韩春河、“北杆”石鸿典；阳谷布永言；堂邑栾省三；馆陶王来贤等绿林武装的资料。

7、有关范筑先组织抗日队伍的数据。

8、有关范筑先重建抗日政权的数据。

9、有关范筑先开展群众救亡活动的资料。

10、有关范筑先反对顽固分子破坏抗战的数据。

四、有关范筑先将军领导的战役和战斗的数据：

1、有关梁水镇（聊城）界牌（堂邑）、南镇（高唐、博平、茌平交界处）等战斗的数据。

- 2、有关范县战斗的资料。
- 3、有关濮县战役的资料。
- 4、有关东阿战斗的资料。
- 5、有关济南战役的资料。
- 6、有关其他战斗、战役的资料。

五、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的资料：

- 1、有关范筑先在聊城壮烈殉国详细经过的资料。
- 2、有关我党领导人哀悼范筑先的唁电、挽联、讲话、文章等资料。
- 3、有关敌、友方面人员对范筑先殉国的唁电、挽联、讲话、文章等资料。
- 4、有关敌、友、我方面对范筑先的回忆录。

1987年10月

质疑·补充·订正——来函摘登

一、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谭启明同志来函：

《聊城文史资料》第一辑“聊城的历史变迁”一文中，对抗日战争以来的变迁，应补充记载：

- 1、一九四〇年曾将聊西划归冀南，成立聊西办事处。
- 2、一九四七年曾将聊西南划出，同阳谷县西北地区合并成立聊阳县。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聊城市米市街张远庆先生来函

《聊城文史资料》第二辑“聊城县敌、伪、顽据点分布概况”一文中，“……县党部组织科长是张远明、张远庆兄弟……”（第32页，8行），失实。张远明是我兄长，一九八三年病故，生前没在国民党县党部担任过任何职务。另外，国民党县党部也没设过组织科，只有组训股。聊城围城时组训股长是刘金之。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

编者按：由于我们在编辑中未能查对核实，现予更正，并向张远明家属和张远庆先生及读者致歉。

三、湖南省科委离休干部林志方同志来函：

《聊城文史资料》第三辑“武训中学”一文中，关于武训中学的校牌，牛文华同志写的是：“山东省堂邑县私立武

训初级中学”是书法家于右任题的字。

从我的记忆和我保留的李士钊同志一九三四年十月廿四日摄影的历史照片，武训中学的校牌应是：“山东堂邑武训中学”，是蔡元培题的字。

又：一〇一页七行“吴亚坞”应为“吴亚屋”

一九八六年五月